



1919

2009

马华文学 90 年与其他

整理：雅波



08 JUL 2012



王昌波伊德工作室
WONG AH LOH
4, Tingkat Satu,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W. MALAYSIA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

9



整理: 雅波

(1) 管窥副刊专辑与马华文学(张光达)

P. 1 - P. 7

(2) 预示一场革命的文坛阅读(伍燕翎)

P. 8 - P. 15

(3) 10年来马华文学在台湾(董锦树)

P. 16 - P. 21

(4) 近十年来的马华文学书籍(李锦宗)

P. 22 - P. 28

(5) 草草了事的“概述”(陈雪凤)

P. 29 - P. 37

(6) 近十年来永别马华文坛的作家(李锦宗)

P. 38 - P. 48

(7) 南洋文艺13年回顾(张光达) P. 49 - P. 51

(8) 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谢诗坚) P. 52 - P. 54

(9) 文学与政治——战前战后的郁达夫·胡愈之
及金枝芒(谢诗坚) P. 55 - P. 59

(10) 在历史与文本之间摆荡——论金枝芒的抗
美战争小说(庄华兴) P. 60 - P. 77

(11) 至情至真: 访李瑞腾、杨锦郁、谈商晚筠
(张丽萍) P. 78 - P. 83

(12) 浅析商晚筠的自我追寻方式(杨后平)

P. 84 - P. 88

(13) 剧终人散雁去留影 —— 征雁的戏剧
(李锦宗) P. 89 - P. 97

(14) 《雪泥鸿爪》中的文坛点滴 (李锦宗)
P. 98 - P. 101

(15) 怀念彭士骅校长 (永乐多斯) P. 102 - P. 106

(16) 壮哉豪哉可瞑目矣! —— 纪念黄润岳校长
(姚招) P. 107 - P. 114)

(17) 从泰北到台北寻曾路 (张永修)
P. 115 - P. 126





1919年10月初新加坡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一向被文学史家视为马华新文学的起点。10年前《南洋文艺》推出80年马华文学系列，访问不同年龄层与关注面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向不同时期的历史。10年后的今天，马华文学步入90大寿，它又进展到怎样的疆域？且看各家探讨近10年来的马华文学进展。

管窥副刊专辑 与马华文学

1998-2008年《南洋文艺》的例子

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的边缘处境，
而文艺作品在以商业大众为导向的报纸中又可谓是边缘性格，
然而透过作家在副刊发表作品，执行者规划引导文艺理念，
以及文学读者群对这些作品或论述的吸纳和接收流传，
却形成一个很独特的“副刊文化”。

副刊是报纸内容的一个单元，而“文学副刊”或“文艺副刊”作为报纸副刊的一个组成单元，取其狭义的内容取向，实与文学艺术作品、文化思想论述密不可分。在马来西亚，中文报纸的文艺副刊，形成一个很特别的传统，既是报业传播文艺思想的一部分，也是文坛结构的一部分，前者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的副刊最为显著，后者对于马华文学的长远发展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两大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的文艺副刊《南洋文艺》、《文艺春秋》，其影响力可能已经超越了马华文学杂志或任何文艺刊物的地位。甚至已经取代了马华文艺团体、出版界和文学杂志的功能，成功整合了马华个别重要作家、文坛、文艺编辑和广大的（文学）读者群。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的边缘处境，而文艺作品在以商业大众为导向的报纸中又可谓是边缘性格，然而透过作家在副刊发表作品，执行者规划引导文艺理念，以及文学读者群对这些作品或论述的吸纳和接收流传，却形成一个很独特的“副刊文化”。如果说在马来西亚，办中文报纸是对肩负华人文化传承的基本责任，那么可以说文艺副刊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建树也具有同等比拟的责任。马华作家当然不一定要透过文艺副刊来发表作品，但是以文学传播的管道或文学读者群的数量来说，报纸的文艺副刊无疑占有最大的优势，它不只是对读者的阅读口味造成影响，还包括作家的书写关怀格局与文坛议题走向形成深远的影响，最终形成副刊与文坛的互动现象，塑造了文学生态的秩序和面貌，执行者的文艺理念和方针起着重要的一环，因此理想的副刊文化应该是上述作家、副刊编辑与读者能够形成互动，来带动整合马华文学格局，或造成一股生气蓬勃的文坛趋势现象。要考察、剖析马华文学的发展，文艺潮流的趋势动向，马华作家的关怀面向等现象，两大报的文学副刊势必成为一篇马华文学究竟的重要途径。换言之，透过探讨中文报纸的文学副刊，我们能够把握某个时期马华文学的生态秩序与书写形式。

近年来“副刊文化”或“副刊学”的研究趋势方兴未艾，在马华文学方面，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郭惠芬在新加坡专文研究战前的《益群报》副刊所发表的新诗作品，中国大陆方面也有学者郭武群的专著《打开历史的尘封——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研究》，以纵横交错的文学史框架来展开论述民国时期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事业发展的辩证关系，可谓一部深入富有新意的学术著作。台湾的林淇滢（向阳）则从“副刊文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审视作家与副刊传播者（编辑）的互动现象，副刊与文坛的传播整合形态、渗透和影响层次。马来西亚的学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有待更多有心人钻研马华新文学的报纸副刊文化。底下整理出近10年来（1998-2008）《南洋商报》文学副刊《南洋文艺》的专题策划，从中得以一窥这10年间马华文学现象的某些重要侧面，如何与这段时期的作家、文本、现实产生对话/互动。至于《南洋文艺》在这10年间所发表的文学作品表现与作家的创作趋势，因为牵涉到更加复杂的世代界限划分、美学观念、语言表现、文化观念等差异认知或文坛变迁，实无法在这篇短文里概述。

创作者与评者互动

这段时期，编辑特别注重策划工作，也带动文学作品与评论的互动交流，2002年开始每一年推出年度文人作家的作品成就展（包括作家的新旧作品、评述、访问稿与印象文字）和各种文类议题的专题专辑（计有极限篇展、非典型诗展、女性作品展、以诗抗战、情诗展、南亚大海啸作品展、我的文学路、最喜爱的作家等），这些特辑对于马华文学作品和作家来说特别具有重要意义，是文坛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透过展示作品与评述文字，带动创作者与评论者（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对话，因此特别能够显出编者对于创作者、读者（消费者）、专业评论者、文坛现实之间的整合能耐。

《南洋文艺》在这10年间的内容取向更转向策划，过去被动的收到哪些作家的稿件就采用哪些作家的作品，现在编者则指定什么主题、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哪些作家或评论者、要哪些性质的内容、篇幅上限定多少字以内、版面编排之类的规划设计。

这10年间《南洋文艺》重要的专题专辑及作品展如下：

1998

《我的文学路》专栏通过老中青三代作家畅谈他们的文学路程和创作经历，提出文学省思和对话，意义重大，大部分发表的作品后来收入张永修编同名书籍《我的文学路》。

《75周年南洋商报编系列》推出曾经影响一时文艺气象的编辑事迹，包括连士升、姚紫、完颜僧、杏影、薛甄白、李向、谢克、彭松涛，编者专栏中言：“一个文坛的风气如何，年轻的写作者是否有机会放胆突破改变，年长的作家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都和‘处心积虑’的编辑不无关系。”诚哉斯言。

1999

《80年马华文学系列》是1999年《南洋文艺》出色兼具意义的，内容取向显示出报章对马华文学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而编者在10年前说的一番话值得全引：“1919年10月初新加坡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一向被文学史家视为马华新文学的起点。从侨民文学，到南洋的文艺，到国家文学的愚而求决……马华文学，在崎岖的行道上跨过了80年。80年的文学史，有多少疑惑已经封尘？有多少迷思仍在继续？有多少玉石未被鉴别？在马华文学庆祝80大寿之际，在世界迈向21世纪之前，《南洋文艺》推出80年马华文学系列，访问不同年龄层与关注面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向不同时期的历史。”共5篇，走访了方修、杨松年、张德忠、许文燕、庄华兴。10年后的今日再回顾这个特辑，其中的种种议题，依然令人深思。

《我最欣赏的作家》专栏自开栏到结束长达4个月之久，共收稿件35篇，反应不俗。《马华文学嘉年华》特辑邀约马华作家共聚一堂，回顾过往，展望未来。

2000

《出土文学系列》最具有意义，共3辑，3个“出土文学”的作家是早期现代派诗人张采因（张景云）、战前小说家铁抗和曾任《蕉风》主编方天。编者坦言这个特辑的灵感来自张锦忠的建议，张氏认为“出土”非经典佳作，重探这些作家与文本，或许比建构经典更功德无量。

2001

《出土文学系列》延续2000年的编辑策划，共2辑，包括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和报人杨际光、马华现代派先驱人物白杰。另有“文学的动态声姿”现代诗曲、动地吟及文学的演出特辑。

2002

《300字极限篇大展》最能见到编者与作者/读者的互动影响，编者打出300字极限篇的征稿启事，数月内广还受到老中青作家的支持和积极响应，极限篇作者以多元形式的创作表现手法，挑战极限篇的极限度，其中匆匆、雅波等人质量俱佳，令人刮目相看。

其他特辑有《年度文人特辑：江湖第一笔张木欽》、《国际诗人节特辑》、《儿童散文展》、《陈强华诗展》。

2003

《年度文人特辑：方纈真》，编者访问了在香港澳门的方纈真的近况和文学事业，邀请与方纈真有文学因缘的天狼或神州师友，评述其人其文，更见方作品的整体特色。

其他特辑有《陈大为散文展》、《匆匆极限篇展》、《南晚筠恩辰8周年紀念特辑》。

2004

《诗专栏：反叛文学运动》的作者白焱乃是马华第一首现代诗的文学史人物，由他来说上个世纪的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史实，有见证历史的意味，这个专栏文字提供有意研究马华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一些基本的史料知识，后来张锦忠也在这个基础上以学术性的严谨角度，扩充其论文的议题辩证。2007年白焱把这些文字结集成书，题为《绿云起于绿草》。

其他特辑有《年度文人特辑：林若隐》、《黄远雄诗展》、《萧敏珊诗展》、《六月诗专号——诗的反叛》。

2005

《北马作家如何面对海啸地震》特辑共4期，刊登身处最近灾区的北马作家书写他们的观察和关怀。

其他有《年度文人特辑：陈大为在南洋》、《李金顺诗辑》。

2006

《以诗抗战》特辑共刊出18位马华诗人的24首诗，诗语言表现手法虽然不一，但诗人对战争的批判与和平理念的追求却是一致的，诗中强烈鲜明的反战色彩与反思批判的力度同样深刻。

其他特辑有《年度文人特辑：小说家小巫》、《马华女作家专辑》、《极短篇评论系列》、《南方之燕人文精神奖得主陈瑞献专辑》。

2007

这一年有资深作家方北方、小说家南川、诗人游川相继去世，《南洋文艺》先后办了悼念特辑，对于这些作家对马华文学无怨无悔的付出与奉献，表达了高度的敬重和肯定。

其他特辑有〈年度文人特辑：诗人沙河〉，同年诗人夺得芝兰诗推荐奖，可谓实至名归。

2008

〈文学 Q&A〉，马华作者的答编者问，也穿插国外的转载文字。通过编者与作者的互动，让马华作者与国外名作家对文学议题发表看法，抒发其关怀面向。

其他特辑有〈年度文人特辑：作家马汉〉、〈元宵情诗特辑展〉、〈向灾场献诗〉、〈出土文人交文诗特辑〉、〈李宗昇诗辑〉。



14 JUL 2009



2009年8月4日

星期二

D 14

◎伍燕翎 [文学评论]

(书影提供：伍燕翎、李少白)

预示一场 **革命** 的文学阅读

2000-2009 年的
马华文学杂志

前言

步入 21 世纪，马华文学应该，亦需要走向另一个新纪元。

自 2000 年迄今，马华文学的发展呈多元面貌，年轻一辈的创作者人才辈出，除了在国内外荣获极富代表性的文学大奖之外，他们以新一代写作者人追求创新、风格独异的写作姿态，遂成马华文学史上另一耀眼的文艺圈。然而，新风格是站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延伸和开展，从马华文学今天的写作圈看来，并没有摒弃旧人旧事之意，反观是新旧杂糅之间，相互碰撞和吸融，遂使这 10 年间的马华文学获得长足的发展。这一点可从马华文艺园地观之，副刊杂志一直是作家们的主要发表园地，持续创作、栽培新秀、传播影响、掌握资源等等，皆赖于文学刊物的长时间的推动。现考察马华文坛这 10 年的文学杂志，藉此窥探马华文学于创作和阅读的面貌。



2009年8月4日 星期二



一、经典的再确立

出版有46期的《椰子屋》于1999年应该算是最后一年，至少目前未见复刊的意愿。然而，约有10年历史的《椰子屋》算是栽培出马华文坛另一批生力军，论创作技巧、题材的实验和多元，他们算是文学视野更开阔的新世代作家。然而，《椰子屋》最终功成身退，难逃停刊厄运。迈入2000年，以更稳重、更全面的姿态出现的文学杂志，应数卷土归来的《蕉风》。自停刊3年，《蕉风》已由大本营吉隆坡这文化中心，移植到半岛以南的新山，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出版，并一直由南马一批文人执掌编辑，凭依他们本身明确的文学认知和思考，《蕉风》这些年对整个马华文学场域的构成起着不可小觑的角色。

一本纯文学杂志能够寻求到马华作家层的认同，其表现方式和出版价值必然成为最重要的考量之一。复刊至今的《蕉风》共出版了12本（有半年刊，也有年刊，有的未注明出版日期），于2008年12月踏入第500期，搜集了马华半个世纪的文学记忆。一窥《蕉风》的栏目设置，专题、创作、论文、书评、资料等，皆均匀分配，不仅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同时也是学院派学术研究的前沿。《蕉风》向来被认为走在“现代”文学最前端，以

寻求马华文学的变革与发展为标杆，这10年的努力证明了《蕉风》确实依循这样的发展路线。于策划、编辑、邀稿、写作、市场等种种挑战和困境之下，仍旧坚守立场，生产出马华文学不管是文人还是学院派皆认为水准持续、品性独特的文学杂志。

纵观之，《蕉风》甫复刊，即

以特刊号推介马华文学属“边缘化”人物——导演蔡明亮和诗人沙禽。所谓边缘化，乃是他们个人创作原则和倾向偏向另类，或属“非主流”和“小众”文学，故所受瞩目的程度，或个人定位亦不时受到争议和忽视。然而，凭《蕉风》编辑所累积深厚的文学识见和修养，他们坚持旁敲侧击由文学艺术呈现的各式面目，以至《蕉风》部分主题，明显辟开主流文学以外的独异视角，挖掘马华文学的实质性，同时于更开阔的文学视野下进行马华文学的传播。492期的“文学赏拾遗”重新挖掘文学奖遗珠和其意义、493期的“性/别越界—爱人同志”思考了马华文学“情色写作”这块领域、497期的“国境以南——新山地方志书写”探勘半岛南端城镇的文学特色，此类专题可谓丰实了马华的文学资源。再者，虽是标榜“现代”的文学流派，《蕉风》对作家方北方、雨川、游川和陈应德（晴川）所作的纪念专辑，显然是后辈对前辈作家的至高敬意，而回顾90年代热辣的“马华经典缺席”各种论述，这可意味着日后马华文学经典的确立他们其实应记一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蕉风》一重要出版工程，乃是积极地培养马华新秀的工作。上述提到“靠近北方的声音：北马作家专辑”的同一期（第496期），《蕉风》亦同时辟“摆摆头八字辈展续篇”（第495期已有），或之后的“浪来了”都是提拨新人独有的创作空间。如此明证可见于旧传统的转述间，迅有新人的承继与开拓，形成其吊诡之处。即使文学创作各文体栏目，也见众多马华新/旧、在地/域外和老中青的文人身影，不拘谨于同仁杂志的作家阵容，这点尤为可敬。不容置疑，《蕉风》囿于这方面作出培育、发现、创新和建立了新世代的文学生态的工作。其他如“马华文学馆X西商”、“论文站台”和“书房书评”以规范、严谨的学术研究思考了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各样的文学议题，是为日后探索马华文学经典的可行性的重要铺垫。

除《蕉风》能深刻地认识到马华文学实质的传播和改革之外，这10年来在文学杂志出版上负起重担的另数由檳城大山脚日新独中出版的《向日葵》。1997年创刊，直到2004年以精裝版联合出版38和39期后暂告停刊。若以近10年观之，《向日葵》双月刊共出版了24期（23本，38、39期为一本），并且由始至终是由资深诗人陈强华领航（后期则由他一手培养的弟子赵少杰负责编务），开垦并经营半岛北端的文学花园。较之于《蕉风》，《向日葵》整体策划和运作会来得较随性，稿件来源也多来自日新独中栽培出的写作者，换言之亦是后来于陈强华领导下成立诗社“魔鬼俱乐部”的文友群策群力负责编辑和供稿。当中名单包括，卢佛宝、陈天赐、邱瑞均、葛锦华、廖肇、黄毅冲、陈惠娟、赵少杰、许志明、黄丽青、张玮桓、王德志、林韦地等，如今有的依然是马华文坛上的出色的写作者，《向日葵》昔日努力可谓没有白费。

翻阅《向日葵》其实不见目录，作为应该以中学生为重要读者群的文学杂志（陈老师认为办《向日葵》最初的激发乃是因为中学生文学素养的低落），《向日葵》的排版设计意属随意，自画插图、漫画绘制和背景图片相当重视，企图吸纳年轻读者的目光。内容方面，主要是创作和专栏文字，写作笔调较无拘无束、处处发挥天马行空的无尽想象和创意，和近10年来《蕉风》较稳重、成熟的作风相比之下，《向日葵》更见活泼趣味，也许是编辑藉文学更接近和影响读者的尝试之一。然而，《向日葵》同时引介国外许多有水准、优秀，甚至另类的作家作品，以待辑、专访和作品展的方式带到读者面前。

这期间，《向日葵》所推介的作家包括台湾诗人曾淑美、罗智成、鸿鸿、夏宇、诗人插画家可乐王、香港小说家西西、美国漫画家舒尔茨和他的《花生漫画》、绘本作家几米、红股翼、谢立文、麦家碧、电影诗人蔡明亮和其电影、剧场艺术家赖声川等，彰显其杂志风格偏向现代、前卫的新思潮。

《向日葵》出版的最后3年，就排版、内涵、形式、方向等各方面而言，逐渐步向统一和稳定。就培养文学爱好者，乃至提拔马华文学新人的办刊信念看来，《向日葵》无疑是成功的，除了上述提到的“魔鬼”作家之外，后期更看见一批马华文坛生力军登场，如木炎、杨嘉仁、阿麟、黄万辉、吕育陶、林健文、林横标等，均辟有文学专栏，或陆续投稿《向日葵》。

作为《向日葵》重要精神导师的陈强华属六字辈老大，诚如他所言，自己是喝《学生周报》、《学报》和《蕉风》奶水长大的，理应熟悉作家迈克，又从迈克文章知道了花生、舒尔茨、香港的亦舒、西西、陆离（《向日葵》第17期），他给《向日葵》注入的文学养分，肯定同样影响另一代人。《向日葵》也许较幸运的是，得到日新独中的经济资助；然而编务和稿源，还是决定了这棵向日葵最终于北方的“人文花园”里枯萎。

二、旧传统的延伸

步入21世纪以后，世界精神文明的建设难保不受到物质和功利主义的阻碍。20世纪以后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即所谓的后马哈迪时代，于政治方面面对极大挑战，政治上的转型因此同样影响了文化、文学这块领域。文化的建设变得愈来愈不容易，商业浪潮乃至商业文化的浮泛足以使精致文学大众化或世俗化。马华文坛尚能于10年间养起一本文学杂志并非易事。这需要出版人和读者两方面的坚守和支持，尤其出版单位，如果能扛起出版经费和编辑工作（包括稿源问题），出版的路算是走了大半。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基本上应该责无旁贷肩负马华文学建设的工作，包括长期出版杂志刊物。由最初的《写作人》季刊到后来的《马华作家》，进入2000年以后又改称《马华文学》、《马华文艺》，这10年期间，《马华文学》几乎每年出版，只可惜此杂志一直无法正其名，比如2000年出版时是《马华作家11》，2001年又成了《马华文学》，而2003年又是《马华文艺革新号》，予人对其出版期数，甚至是否同一本杂志的延续亦出现了混淆之感。《马华文学》一直由资深作家李忆蓁主编，创作占主要，亦收录国外作家作品，附录作协的活动资讯、国内外交流等，时而设有专辑，例如2000年有“逍遥天纪念专辑”、2003年有“受表扬作家作品专辑”、2006年有特别为纪念马华著名剧作家征雁病逝撰写之文章。作协会员大部分是老中辈作家，可《马华文学》并不忽视年轻写作者。作协原是国内推动马华华文创作的最主要推手，可《马华文学》似乎多年来还不能似《蕉风》和《向日葵》养住特定读者群的胃口，这无疑

和一本杂志的品格和定位密切相关。虽然如此，作为一个代表国内华文作家的文社，马华作家若要走向国际，我们的作家作品需要长期输出国外，从其收录作品的区域范畴来看，《马华文学》确切提供了这个平台。

2009年6月，《马华文学》以全新面目示人。2009年的《马华文学》则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同时分成创作集和评论集两本。创作集《时光之旅：马华文学2009》已于6月出版，评论集尚在出版中（预计8月面世）。创作集可见已收入更多年轻一辈（包括八零辈）的作品，虽不再是杂志的形式，却保留作协出版此杂志的最初动机，相信这样的出版方式对马华文学更有保存的价值。

其他杂志还有《烟火》和《清流》两本。《烟火》是由马华文坛中坚作家戚继主编的文学季刊，逢3、6和9月出版，自1999年创刊至今不曾间断。与《马华文学》一样，它的来稿遍布国外，创作方面更有来自大陆、加拿大、澳洲、新加坡、香港、泰国等地。《烟火》时有如“方修文学生涯60年庆祝会”、“《赤道风》创刊20周年纪念文学研讨会”等专号专辑，为马华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清流》整体印刷要比《烟火》来得精致，基本上是两三个月出版一次，由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曾由田丹和王涛主编，目前则是章钦。《清流》同样着重于创作，多出现的本土作家有吴岸、丁云、章钦、年红、田流、伍良之、看看等人。此两本杂志风格相去不远，由于多是马华中坚作家群的作品、写作手法笔调都较为朴实，对年轻的读者难免少了吸引力。然而，《烟火》和《清流》的重要，乃是它们给前辈作家们提供需要/重要的文艺园地，并且以他们的经验，凝聚了推动马华文学的力量。《烟火》设有“小荷才露”鼓励大专和中学生参与写作行列，亦常有中学作文比赛优秀作品展，对文学普及的工作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



最后，应该一提的是新世纪中文系出版的《中文·人》。《中文·人》不算是纯文学杂志，是较倾向文史学科的一本同仁杂志。《中文·人》于2006年4月创刊，为半年刊，目前共出版了6期。于马华文学而言，《中文·人》颇有“文学创作”，主要是马华新生代的作品。《中文·人》每期以不同专号出版（除第一和二期），专号的范畴几乎都跟马华文学相关，长期下来可成为马华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源。目前所策划的研究对象和探讨课题，包括马华小说家小黑、诗人沙青、东南亚汉学下的马华文学研究、张景云谈马华文学的“现代性”、华马文学的翻译和林金城谈马华文学的“旅游”特质。另外，《中文·人》在整理文学史料、建立资料库方面也下了功夫。由于属学院派的半学术性杂志，上述文学议题的探索显然开拓了马华文学于学术史上有系统的研究工作。

结语

近10年来的文学杂志不算多，更谈不上多元、路线各异，甚至影响一代之文学。较之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甚至更早之前，文学杂志必是当时代的文化趋势和文学范式。社会随着科技时代前进，已经是网际网络无孔不入的时代。文学的传播也许已不仅仅靠平面媒介，而在今天读者的阅读取向面对众多选择和诱惑之际，文学杂志应该如何安身立命恐怕是不得不重新思索的问题。另外，一本杂志要如何养住今天读者群的胃口，其办刊方针、理念，乃至杂志风格进而成为众多杂志中的一个品牌，也是文学杂志出版的重要考量。这无疑已经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年代，文学阅读的多种可能已如一场革命即将到来，谁还有信心，下个10年我们还会有多少本文学杂志？

2009年8月4日 星期二





1919年10月初新加坡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一向被文学史家视为马华新文学的起点。10年前《南洋文艺》推出80年马华文学系列，访问不同年龄层与关注度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向不同时期的历史。10年后的今天，马华文学步入90大寿，它又进展到怎样的疆域？且看各家探讨近10年来的马华文学进展。



10年来马华文学在台湾

◎黄伟树博士【文学观点】

我总觉得，马华文学的生产一直处于迫切的危机——基本上以年轻人为主，续航力不足，文学累积过慢，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而旅台这块，因大都在学院，比较像是研究团队。

被教学与研究占去大部分时间后，创作难免相对的萎缩了。

从第一代的星座诗人同人、蕉风世代（李有成、张锦忠）莫不如此。

马华

文学 90 年？先就这数字表达一下我个人的一点异议。

从 1919 年算起，那比中国现代文学、文学革命晚了两年，似乎不免估算得太早了些。就其作为准民族国家文学的马华文学而言，准确的说，1919~1957 那 38 年间学应具体命名为英属马来半岛殖民地华文文学。1957 年之后，方有所谓的马华文学。如果不接受国家独立为分割的标准（民族国家准则），那就会不承认 1965 年后那岛上的文学属于新加坡文学、不承认那是独立的实体。

这怎么说都荒谬的。

而从 1957 往后算，不过 52 年而已。而这 52 年间，有 6 年延伸向新加坡，将近 50 年延伸向台湾岛一隅（如果从王润华、陈鹤翔等 1963 年在台北创立星曜诗社起算的话——那就和新加坡国家文学一样长）。所谓的在台/留台马华文学，在那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凭借借来的资源，缓慢的耕耘、一点一滴的累积着。换句话说，在马与在台成了马华文学的两条生产线（双轨），这几乎在马来亚建国伊始就决定了的。马来亚建国于韩战结束后（南北韩于 1953 年 7 月 27 日签署停战协定；美国势力强势介入东亚，强化了冷战在东亚的结构），立国之初就决定它所属的意识型态阵营，也近乎决定了左倾文学的命运。

隔台或落台，一方面因为介入了 1960 年台湾的时间性，一方面是形成它自己的里程，文学的时间刻度也不宜以那样的整数（譬如 1999~2009）计算。但在这篇小文章里，倒可暂置不论。

先谈谈“10 年”这时间段限的意义。“台湾生产线”基本上是留学生现象的衍生物、副产品，因此它的主体有一部是留学生。就台湾的学制而言，大学一般 4 至 5 年（医科生 7 年），如果用功又运气不坏的话，10 年可以让一个留学生从大学念到博士班（如果他想念的话）；也可以让一个硕士生完成硕博学业甚至取得助理教授资格。就一位初入行的写作者而言，可以让他完成、出版最初的二、三本作品。就不同的世代而言，有的进入中年，有的步入晚年（1947 年生的李永平，62 岁了；1957 年生的张德忠，也年过 50；1969 年生的陈大为夫妇，年届不惑了）所有的大学生都成为青壮年，不再是单纯的文学青年。

因为毕竟是发源自来台湾念大学这回事，10 来年，取得博士学位且在大学里取得专职的，除了原来的李有成（中研院）、陈鹤翔、李永平、张锦忠、林建国及我本人之外，陈大为、钟怡雯也已在大学任教多年，高嘉谦、殷健宣则是 2008 年前获聘助理教授者。这点也道出了此一生产线的特色之一：有着明显的学院的、学术研究取向。因此马华文学研究业已成为当代台湾人文学术产业的一环。

在这方面，就明显的是由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等资深主编出版的两部大型马华文学读本《赤道形声》（万卷楼，2000）、《赤道国声》（万卷楼，2004）；前者是涵盖了三大文类的当代马华文学作品选，前者在选文上（尤其是散文及小说）留台作者群的作品都占了很大的比重；后者是评论选，选了2003年之前的部分马华重要论文，作者除大马同乡外，还包括台湾、中国大陆的研究论文。2004年陈大为夫妇更进一步借用台湾行政院国科会的资源建立了“马华文学评论数据库”，把一些得到授权的马华文学评论电子版上传供免费下载；并于3年后扩大成立“马华文学数位典藏中心”，在评论之外，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内容（譬如把他们编的、元智大学中语系资助出版的3卷本《马华散文史读本》〔万卷楼，2007〕数位版上传），对于新、马、台湾之外对马华文学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可说是提供了不少便利。

就文学奖而言，就若干现象叙述一下。就这10年的前两年，得奖最多的还是陈大为与钟怡雯（详见马华文学数位典藏中心及他们作品封面折页的简介），两位都是老面孔了，也毋庸多介绍。陈、钟之外，10年间得奖最多的，是辛金顺（1963-），10年内有7个奖次，最大的加以（注音）获第29届中国时报文学奖新诗首奖（2006）、以〈过阜城门鲁迅故居〉获第13届中央日报文学奖新诗评审奖、以〈蟹迹〉获第9届台北文学奖散文优选（2006）、以〈燕子〉获第20届梁实秋文学奖散文优秀奖（2007）等。辛金顺也算是老面孔了，但因为起步较晚，得奖的“辈份”反而居后了；而诸文学奖，一般而言，都还是新人的舞台。



（书影提供：李少白，摄影：陈启新）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的马华青年在台湾借文学寻求文学认证，这10年间，相对的变多了——相较于留台新人的锐减。自1996年黎紫书以《蜃楼》获第18届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以来，2000年黎以《山鹿》获第22届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大奖、2002年贺淑芳以《别再提起》获第25届中国时报文学奖评审奖、2004年龚万辉以《隔壁的房间》获第26届联合报文学奖散文第一名、2005年陈志鸿以《腿》获第27届联合报文学奖大奖、2005年黎紫书以《七日食遇》获第27届联合报文学奖评审奖、同年她以《我们一起看饭岛爱》获第28届中国时报文学奖评审奖——但黎其实也是资深写作者了。2008年贺淑芳以《夏天的旋风》获第30届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贺淑芳（1970年生）在年龄上虽比黎稍长，但确可算是这10年间出头的颇有潜力的新人，得奖时人在马，得奖后曾以外籍生来台，花数年修得政大中文所的硕士学位，现已返马服务于某大专。龚、陈倒是名副其实的新人。

小说之外，诗的情况也相仿。2000年吕育鞠以《只是穿了一只黄袜子》获第23届中国时报文学奖第三名、2001年周若鹏获90年度优秀青年诗人奖、2003年末巍获年度优秀青年诗人奖、2003姚文光以《一日将尽》获第25届联合报文学奖大奖、2005周若涛以《在遥远随行的国度》获第28届中国时报文学奖评审奖……。

此外，还有一些更年轻的新人如曾翎龙（《在邀请人》第一届林语堂文学奖小说第三名，2007）、吴道顺（《蓝-袜子》第21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佳作，2007）、谢明成（《物体X1》获台湾诗学15周年新诗创作奖，2007年、《脱身术》2008年中国时报文学奖散文评审奖）、罗志强（《解码》第20届梁实秋文学奖散文佳作，2007）等崭露头角；部分应是在穗的留台生，同时尝试各种文类，也都是比辛金顺小20岁左右的新人。

在个人出版方面，也有一些累积。以下把10年间旅台作者的出版品（评论只列与马华文学有关者）大致罗列（依作者年岁排序）：

李永平 《但迦美·李永平自选集 (1968-2002)》
[麦田 2003] 小说
《南窗墨露》(天下文化 2002) 小说
《大河尽头(上)》(麦田 2008) 小说

陈慧桦 《我想像一头骆驼》(万卷楼 2003) 诗集

李石成 《时间》(书林 2006) 诗
《在甘地铜像前》(允晨 2008) 散文

张贵兴 《猴杯》(联合文学 2000) 小说
《我思念中的南国公主》(麦田 2001) 小说

张锦忠 《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
[麦田 2003] 评论

张锦忠编 《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2004]

张锦忠/黄锦树编 《别再提它》[麦田 2004]

辛金顺 《月光照不同的路》(九歌 2008)

黄锦树 《由岛至岛》(麦田 2003) 小说
《土与火》(麦田 2005) 小说
《焚祭》(麦田 2007) 散文

李天葆 * 《候群艳》(一方 2002)
《盛世天光》(麦田 2006)

黎紫书 * 《天国之门》(麦田 1999)
《山岚》(麦田 2001)

陈大为 《尽是魅影的城国》(时报 2001) 诗集
《靠近罗摩衍那》(九歌 2005) 诗集
《句号后面》(麦田 2003) 散文集
《火风燎原的午后》(九歌 2007) 散文集

钟怡雯 《我和我亲爱的宇宙》
[联合文学 2002] 散文集
《飘浮书房》(九歌 2005) 散文集
《野半岛》[联合文学 2007] 散文集
《阳光如此明媚》(九歌 2008) 散文集
《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
[万卷楼 2009] 评论

黄万辉 * 《隔壁的房间》(宝瓶 2006)
《清晨校车》(宝瓶 2007)

陈志鸿 * 《腿》[印刻 2006]

* 记号者人不在台湾，因作品在此生产线上，姑列之。另单篇论文、单篇作品、文学奖得奖详细记录等，均不一一罗列，有兴趣的读者请自行参考前述版本及数据库。

李有成的《时间》是旧作重印，是他自己作为文学青年的纪念碑。他和李永平都是放台写作人的第一代。而这10年间，陈大为钟怡雯的出版质量可说居冠。而资深作者中，张贵兴竟有8年未见作品；真万辉、陈志鸿都还是新人，还有待观察。在论述上，张锦忠、钟怡雯、陈大为、高嘉谦和我都有多篇马华文学论文，或致力于离散论述，或进一步深论马华文学的政治属性、马华文学的浪漫传统；或把视野延伸向东马本土、自然书写，尝试探勘马华文学的不同面向。然而我总觉得，马华文学的生产一直处于迫切的危机——基本上以年轻人为主，续航力不足，文学累积过慢、也难有突破性的进展。而放台这块，因大都在学院，比较像是研究团队。被教学与研究占去大部分时间后，创作难免相对的萎缩了。第一代的星座诗人同人、蕉风世代（李有成、张锦忠）莫不如此。虽然，就放台而言，这10年的作品不乏里程碑著作。

当评论累积到一定程度，更可见出文学累积之不足——它恐怕无法长期支应学术研究的需求。“数据库”的存在更让这问题变得再明显不过：评论的生产，虽然是一种解释活动，但作为产业，它也在消耗着作品。因为评论的量产相较之下比作品容易得多，虽然不见得总是有新意。





1919年10月初新加坡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创刊，一向被文学史家视为马华新文学的起点。10年前《南洋文艺》推出80年马华文学系列，访问不同年龄层与关注面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向不同时期的历史。10年后的今天，马华文学步入90大寿，它又进展到怎样的境况？且看各家探讨近10年来的马华文学进展。

近十年来的 马华文学书籍

◎李德宏 [文学观点]





马华

文学书籍主要是本地作家在国内出版的各种文学体裁著作，也有少部分是在外国出版的，例如黎紫书的小说曾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一些在外国工作抑或深造的马华作家在他们的所居国抑或所居地出版他们的作品，例如在新加坡的丁云，在台湾的钟怡雯、陈大为和欧阳林等人，在香港的温瑞安和林幸谦等人。在他们之中，有的著作也在马来西亚和中国面世。

近 10 年来的马华文学书籍，每年的出版数量不大一致，有时很接近，有时相差太远，平均每年出版 60、70 部各种体裁的著作，偶尔其中一两年，在出版数量上猛增抑或骤减，因为具备更多的积极因素抑或缺乏几项应有的条件，不过，难能可贵的是整体上都能保持质量，有的有所超越。

其实，马华文学书籍在较早时，受到有关当局和社会有意抑或无意的漠视，一直在凄风苦雨中惨淡经营。当时不少特出的作品没有机会付梓，后来散失，造成马华文学在遗产上难于弥补的损失。过后，有识之士设立马来西亚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资深作家云里凤先后倡设德解文丛、童玉棉文丛和兴安文丛，让较多的作家把他们的心血化为印刷纸张，装订成书。大将出版社（即以前的大将事业社和千秋事业社）陆陆续续推出各类文学丛书，彩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跨世纪女作家系列”，立陶出版有限公司、砂华作协、诗巫中华文艺社、美里笔会、砂拉越星座诗



社、霹雳文艺研究会、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协会、住辉出版有限公司、嘉阳出版有限公司、红蜻蜓出版社、有人出版社、超人民事业有限公司等等文艺组织和热心推动马华文学的出版公司也推出各自的丛书。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and 雪隆嘉应会馆每两年个别出版的微型小说和散文创作比赛优胜作品专辑，显然是它们参与马华文学节活动的成绩单。并且使它们征集到的优秀作品得以保存和流传下去。部分马华作家自己也作出努力，使本身书写的文字印成单行本。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几家出版公司也为那些居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在马来西亚的马华作家提供出版的机会。这些积极的因素促使马华文学书籍的出版走出早期的阴霾角落，面向广阔的天地。

在这10年来，每年的散文集（包括杂文集、小品文集、议论文集等等）出版数量都领先，其次是小说集，诗集居第三。

由于教育部已把童诗列入华文小学的华语教科书，老师也鼓励小学生多读少儿读物，这使少儿文学的发展迅速，出版数量与年俱增，有时不会少过诗集，偶尔甚至会超越低潮时期的小说集。

由于教育普及，跨过大学门槛的作家如过江之鲫，加上多所大学和学院有中文系之说，它们的学生、讲师和教授时有文学评论的发表，因此文学评论集的出版数量也随着增加，这是以前少有的现象，这也是当今乐于见到的可喜现象。



[1999]

1999 年是马华文学书籍出版的巅峰年，单单散文集就有 60 部左右，其中爱薇占 5 部，欧阳林占 4 部，沈安琳占 3 部，潘碧华、曾毓林和许慧珊等人各占 2 部。小说集的问世也是历年之冠，大约 22 部，其中温瑞安和张草最少占 3 部，黎紫书占 2 部。已付印的诗集最少也有 16 部，张句占了 2 部。评论集只有 4 部左右。

[2000]

在 2000 年，散文集出版了 50 多部，其中傅承得占 4 部，欧阳林占 3 部，杨白杨、叶宁等人各占 2 部。小说集比去年少了一半，大约 11 部，其中郑良树和张草各占 2 部。诗集也减至 5 部左右。评论集则增加到大约 6 部。

[2001]

在 2001 年，散文集出版了 40 多部，欧阳林仍然领先，占 3 部，爱薇和张景云各占 2 部。小说集大约 12 部，其中包括黄锦树的《刻青》和《由岛至岛》。诗集略增至 8 部左右，包括林幸谦的《原诗》和方晏的《那乳头上的毛》。评论集也增加到大约 7 部。

[2002]

在 2002 年，散文集猛降到 30 部左右，其中有马汉的《风雨人生路》和笔抗的《夏日蝉鸣》等书。小说集大约 13 部，其中包括南川的中篇《河志》、潘雨桐的《河岸传说》和马仑编的《马华文学大系·中短篇小说（1965-1996）》。诗集 7 部左右，包括田恩的《田恩诗歌自选集》。评论集则也减少到大约 5 部，其中的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合编的《趣味马华文学：90 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是一部甚有参考和研究价值的书籍。



[2003]

在 2003 年，散文集继续下降到 20 多部，其中有林幸谦的《漂洋国土》和甄供的《何清园夜话》。小说集猛跌到大约 8 部，其中一半是东马作家的著作，例如融融的长篇《青山依旧在》和张草的《明日灭亡》。诗集保持 7 部左右，包括张惠恩的《站在遗忘的对岸》。评论集则恢复到大约 7 部，刘育龙的《在权威与偏见之间》也在内。

[2004]

在 2004 年，散文集激减到大约 14 部，其中包括张木钦的《浪花亭》和年红的散文集《爱心相连》。小说集略增到大约 10 部，张弓的《大冷门》和丁云的《迷途的黑熊》是其中两部引人入胜的书籍。诗集则微增到 8 部左右，其中有吴岸的《破晓时分》和彼岸的《写给祖国》。评论集猛增至约 13 部。这是近 10 年来最早见的良好现象。在这些集子中，比较重要的计有鲁铤编的《江天研究论集——〈土地的呐喊〉评论集（上）》和谢川成主编的《马华文学大系·评论》等书。

[2005]

在 2005 年，散文集激增至 30 多部。钟怡雯独占 3 部。其他比较受到欢迎的著作计有姚拓的《雪泥鸿爪》和张木钦的《从旁杀出》。小说集也增加到大约 15 部，其中包括黎紫书的《出走的乐园》和丁云的《最后的义顺村》。诗集略减至 6 部左右，包括陈雪凤编的《马华文学朗诵诗选》。评论集则猛降到大约 3 部，其中的梁志庆的《走进童诗的乐园》是一部研究童诗的重要著作。



〔2006〕

在2006年，散文集减少到24部左右，其中有陈雅琳的《漂泊的家》和苏清强的《希望的树》。小说集也微减到大约13部，其中包括方路的《挽歌》、黎紫书的《无巧不成书》和骆驼的长篇《寂寞行者》。诗集则减至4部左右，这是10年来最低的数量水平，邢治旺的《钢铁时代》是其中一部较出色的作品。评论集则增加到大约9部，大多有学术水平，例如陈大为的《思考的圆周率：马华文学的板块与空间书写》。

马华文坛·年度盘点

〔2007〕

在2007年，散文集略增到29部左右，其中有何乃健的《让生命舒展如树》、钟怡雯、陈大为合编的《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3卷和郝田的《倾听河水》。小说集大约8部，降至2003年的数量水平，其中著作包括丁云的《丁云小说选》和长篇《赤道惊蛰》，还有南川的《轮椅上的琴声》和中篇《沙河长流》。诗集激增到11部左右，包括田夜编的《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文诗选》和游川的《游川诗全集》。评论集则减少到大约4部，其中包括吕晨沙的《尘沙集》。

〔2008〕

在2008年，散文集的出版情况跟2006年差不多，大约有24部，其中有黎紫书的《因时光无序》和孙彦庄的《红极梦情站》。小说集略增到10部左右，在内的张锦忠、黄锦树和庄华兴合编的《回到马六甲：华马小说七十年》和黑岩的《毒雨的传说》另有风格。诗集则降低至6部左右，包括李寿章的《黑暗中的生命》。评论集也减少到大约2部，这是近10年来最少的，其中一部是刘育龙的《在权威与偏见之间》。



[2009]



編輯：張永發

(书影提供：李锦宗、李少白。摄影/叶添益)

2009年10月6日 星期二

淡经营。
在凄风苦雨中惨
意的漠视，一直
社会有意抑或无
受到有关当局和
书籍在较早时，
其实，马华文学

在2009年，截至7月份为止，所见到
的新出版马华文学书籍并不多，因为
只靠本地几家出版社撑场面，成不了
气候。如果仍然缺乏有利的因素，这一
年的出版数量将陷入类似2004年的低
潮。在这一年头6个月，散文集出版了6
部左右，其中包括看看的《人间风雨》和
曾银龙的《我也曾经放牧时间》。小说集
只有大约2部，即田农编的《马来西亚
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1946-1970）》
和李开璇的《红尘中的新花园》。诗集
保持6部左右，其中有萧遥的新诗及译
诗集《暗影&古诗19首》和刘艺璇、傅
承得合编：《动地吟朗诵诗选》。评论集
则增加到大约5部，都是大学讲师或
副教授的著作，例如张依华的《隐喻的
流变：杨牧的散文研究（1961-
2001）》、潘碧华的《马华文学的时代记
忆》和林春美的《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
华文学论述》。

面对未来，马华作家首要的任务，
有必要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创作水平，使
马华文学能够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大放光
彩，以加强他们的出版条件。

雪隆潮州会馆和马潮联会应该继续
定期颁发文学出版基金和举办杰出潮青
文学奖。雪隆海南会馆和其他组织及出
版社也应持续推出文学丛书，协助推动
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其中一项高层次
的文化——马华文学。对于马来西亚华
文作家协会，在这一方面更加义不容
辞，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为马华文坛
作出更多的贡献。

出版文学书籍是非常消耗财力、人
力和时间的工作，而它的效果往往在多年
以后才显现出来。小说家陈政欣曾经
撰文倡议制作电子书，以解决当前出版
文学书籍的时候和以后所面对的问题。
这个建议是高瞻远瞩的，也配合当前和
未来的时代，应该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陈雪凤 [文学观点]

草草了事的 “概述”

读〈独立后马华文学史概述〉

陈鹏翔在标明概述马华文学史的文论里，不但先给予简单化，而且在一笔带过的叙述里，蓄意给予歪曲，淡化了它的意义说只是停留在确立文学本体性的阶段，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未有可挂齿的意义。



《独立后马华文学史概述》

的作者是马来亚留台生陈鹏翔。他对马华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上个世纪末，约 80 年间的发展脉络和概况的陈述，带着明显而强烈的偏见。他在到台湾去留学之前，在念中学时就很热衷于写作。但不论是所写的散文或新诗，都很传统，是沿着中国新文学马华文学历来所依循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与理念而写作。换言之，陈鹏翔在到台湾去深造之前，是一位爱好文学在马华文坛略有名气的文艺青年。

在这里，我要说的主要不是外星人，或者什么天才的人物。他是受马华文学哺育成长的文学人。

然而，他留台学业有成，在 50 年后，回过头来研究马华文学，以及写作《独立后马华文学史概述》，却以摆出一个叛徒的姿态为乐与为荣。他蔑视马华文学，而仇视现实主义与马华文学遵循的现实主义。

在他的言论里开章部分，他对马华文学在战后的世界大气候下，在发展过程曾爆发了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爱国主义运动”，而有一大批土生土长的新作者涌现的事，却以他的成见说：“这批”“土生土长的本地作家这时候的关注不再是诅咒、揭露黑暗势力，就是讴歌新生的力量、赞颂劳动和理想。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他们经常表现主题。”

他这样酸溜溜而又带着鄙视的神气所说的话，实在叫人反感。

战后当地作家写作的重点，同诅咒现实生活的不平等，官僚统治者和他们的帮凶，揭露社会黑暗的旧势力，如何勾结官府，欺压剥削老百姓，逼良为娼，鬻毒无辜青年的现象，将重点（即关注点），转移到讴歌新生的力量，社会

出现的新气象，赞颂劳动和理想。这有什么不对？

土生土长的本土作家有理由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为写作主题，不正确吗？

难道要像那种接受了外来侵入的企业家的一点一滴的惠赐便大写文章论文吹捧为什么跨国特色与主题，才是正道吗？

与此同时，陈鹏翔也紧随着马华文学的烧芭黄锦树的后跟或泥脚印，利用五脚基上某些角落，很首鼠尾地喃喃：马华文学是僵硬刻板的。它之能够摆脱这种性格，完全是得力于有留台生从彼邦带回来的现代主义。

(二)

陈鹏翔偏见吹捧之外，在他的文论里也表现了不少错误与误解。

他说：“那些爱国写实诗教大多重于说教，忽略了主题与技巧的平衡经营，因此反黄与爱国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然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活力朝气，但放在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里，它们都尚未摆脱事实上是还在确立文学主体性的阶段—马华文学独特性阶段。真正有新风格、新感性、新透视力的作品，出现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前后到6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

可以说很清楚，他这话说到的全与马华文学在战后初期的发展状况无关。而是意在进一步贬低马华文学新的形象。而且，在陈述上十分不负责任。

马华文学在战后（即50年代间）发生的反黄运动与爱国主义运动，是马华文学发展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运动。它在时间上是沿袭马华文学的主体性一脉相传的发展过程。即是说，这两个运动就是马华文学反封建、反侵略与发挥现实主义干预与批判现实的精神的运动。它使马华文学更接近与配合要求民

主自由的时代潮流，让马华文学在实质上为社会意义作用发挥了更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然而，陈鹏翔在标明概述马华文学史的文论里，不但未给予简单化，而且在一笔带过的叙述里，蓄意给予理由，淡化了它的意义说只是停留在确立文学本体性的阶段，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未有可挂齿的意义。于是轻轻地跨过这段撼动殖民统治体制的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以对现实主义的马华文学划下进一步的抹杀），目的，只在刻意强化在当时乘机冒出的作为分化有关运动的反动力量的现代派。

更严重的是陈鹏翔到了 21 世纪的时候，还有勇气说随后 50 年代的马华文学还受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主宰。

侨民意识，如果还存在，而且是主宰着马华文学的意识思想，那么，所谓爱国主义又从何来呢？陈鹏翔在这里，可能是在说梦话。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发展史上，自 50 年代开始，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年学子到台湾去留学。尔后回返新马家园，从事教育与文化（包括文学创作）工作，发生了重大与深远的影响。这是可以肯定与理解的。不过，要是好像陈鹏翔那样，抹杀了其他的一切因素，把那年代的留学生当作救世主看待与评价，则是可笑的。

（三）

陈鹏翔的《独立后马华文学史概述》，严格地说来，并没有历史可言。因为他把对这段时期，马华文坛的现象的叙述，时间的流程已经被阻截，他所提到一些重要事项（历史阶段）的叙述，都没有标明时间。

在陈鹏南的叙述里，他既模糊了时间的概念，而使到事项与事项的发生，彼此之间有何关联，显得很混乱，没有条理，更搞乱它们间前因后果的承传与发展。特别是他谈到马华文学小说发展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不但忽略了许多小说作者与其作品，也就忽略了或切割了由日治时期或战争时马华小说的耕耘与成果，如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试验与所取得的成就，作为基础或桥梁，以过渡与发展到50年代至60年代的再出发与复兴的过程。他只把一个马华文学发展过程的重要阶段的文学活动与其收获，东拉西扯地简单地把以方北方、苗秀、韦肇和赵戎几位老作家的长篇小说作话题，而让叙述的笔墨像李白的《下江陵》诗句那样，“千里的江陵”一瞬而过。于是就算考察了为时的20年的马华文学小说的发展过程。陈鹏南是十分轻率地来处理他标用要概述的独立后马华文学史的论述。同时，更有问题，蓄意在误导读者的是，他是非常主观地信口雌黄，为这个时期的马华文学小说创作情况作出极端偏颇的断论。他说：

“现代文学的出现虽促使马华文坛分裂为二，现实主义和现代派一时壁垒分明，并不时引起一些文艺论战。一直要到70年代中期才能逐渐相容、渗透、颠覆。所以在马华文学的发展史上，独立后侵入文坛的现代主义应视为文学分期的另一个重要分水岭。至于这种文学思潮/技巧是否已形成一种宰制力量并把现实主义完全打垮，那显然已非焦点所在了。”

在这之前，有留台的马华学生曾经假借谈论方北方的小说，大肆批评方北方，否定他在马华文学园地辛勤耕耘与播种的贡献，从而矢口指马华文学破产了；现实主义完蛋了的宣言，颇便到一

些国内舞台生心里暗喜或拍手痛快。而今陈鹏翔更步其后尘，通过概述独立后马华文学史的严肃文论，重提（亦是哲人牙慧）源自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入侵马华文坛后，通过火起云涌的论战，现实主义已被打垮了。他们的出发点，虽然都在破坏马华文学与其在海外华文学中的形象（包括地位），但，陈鹏翔是比较轻快与舒服的。因为陈鹏翔不必奔波千里跋涉，只须躺在书房，悠优地睡梦而已。

50年代末至60年代，马华文坛虽曾发生一场火力喷发的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的论战。但论战是相持不下，而落得个不了了之。只是论战的本质，现代主义一方是入侵的进攻，现实主义是出于维护与卫土战，问题是若说是现实主义完全被打垮，那纯是天方夜谭。

如果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事实，现实主义的作品，在马华文坛至今依然繁花绚烂，招展多姿。

四

陈鹏翔的《独立后马华文学史概述》是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在第2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宣读的。但很奇怪他并没有志明写作的时间，撰写学术论文能允许隐瞒写作时间吗？

第2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2004年11月在山东大学威海国际学术中心举行。因此，我估计陈鹏翔这篇文论应在2000年之后，2004年之前动笔撰写的。那么，由马来亚独立的1957年至2000年，这一段时间至少有43年之久。可是，他所看眼的马华文学的小说家，却只有区区的4位，即商晓筠、潘雨桐、姚拓和小黑。（至于方北方、韦翠和苗秀、赵戎4位老作家，他们在战前时期的马华文坛，已是著名的作家）。其实，在这时期，真正应该被提及的土生土长的小说作者，还不少呢！他们在独立后马华文学史的地位也是很重要，不但都写出过一些很

出色的小说。而且也很有影响，比如陈政欣、宋子衡、南川、山芭仔、云里风、李蕙蕙、马汉、曾洁、碧澄、雅波，还有梁放和鞠药如等等，陈鹏翔都好像一无所知，根本没一字提及。其实，这群被遗忘的小说作者，陈鹏翔应该都相识，他没提及，是不敢提及，意在逃避责任。提及在新加坡方面的老作家，他也忘记了姚素，以及丘繁繁等等。也许他认为这些作者中，大都不能比得上姚拓。因为，姚拓是他最崇敬与看重的马华文学的小说家。

(五)

在谈到独立后马华文学史的新诗与诗人方面，陈鹏翔也像在谈小说家一样地忽略了一大块，这也不是什么失忆，而是光天化日下的封杀。

在至少 43 年的历史时期里，他提到的马华文坛的诗人，除了在地 3 位，即吴岸、陈强华和傅承得外，主要是在台港的陈大为、辛金顺与林幸谦。他没提：游川、田恩与温任平，还有何乃健和小曼、林武聪、冰谷等等。

陈鹏翔撰写《独立后马华文学史概述》，不但没有描述文学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现实（社会）背景，给人的印象是马华文学的创作与作者都是超然的人物。它们无关于社会现实，社会环境与政局也与之无关系。其次是非常主观地只以个人的认识与喜好，肆意地删除一定的作者与其作品，根本无法反映出马华文学在独立前后特定时期的盛旺与蓬勃，富有新生活力的活动和发展景象。他也很不负责任那样地随意删除或跳越一个个年代，将某些时期的文学活动和作者全面地留白。

他在谈到独立后马华文学史的散文一节时，表现得粗鲁与封杀的情况，尤其过份，全然不像写史。

他看到的马华文学散文与作者，开始于90年代，各此前30多年的历史，他竟全部割弃。他说：

“90年代的散文创作以潘索策、宋肇、林青雄、钟怡雯、陈大为等5人最突出。”

这就是在文论中对马华文学史散文的概述。而这5人中，肯定有4人是不在马来西亚，3个是在台的留学生或就业学人。

如果他这样的概述，也可算是在写文学史概述，那么，最多只能说是马来西亚留学台湾的文学史概述。它是与马华文学无关系的。

虽然陈鹏翔是源自马来西亚的文学青年，但因为到台留学后，即留校当老师，久久才返马一趟。他对马华文学在独立后的活动与发展是很陌生的，加上他又拥有强烈的偏见，主观且没有公平对待历史事实的史德，期盼他写出比较有条理、能够忠实出历史事项与人物的历史概述，结果肯定是缘木求鱼。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的这篇文论，在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作了报告与收入单行本后，文坛上就再也没人提及过的原因所在了。

没有史识、史德和史观，而又来撰写历史概述。陈鹏翔是很有勇气。然而，他更有勇气而自以为是的，还在他既自信只要他封杀不逮，那独立后马华文学史上的不少事项与人物，便会没销不存在。而如果经过他漫骂的人，便也会成为真的恶人或罪人。比如他说：

“自大马独立以来，除了当年《南风》及《学生周报》群在积极提倡现代义外，其他还有许多老中青作家，由于资讯的获取不易或是受到各影等这样的编辑的影响，即使到了五、六十年代，他们仍因沉溺在鲁迅、茅盾或是苏俄高尔基等大师的

就停下创作。西方的叶惠、庞德或艾略特固然不屑一顾/读，对深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干扰的九叶派诗人如辛笛、穆旦和袁可嘉等可能前所未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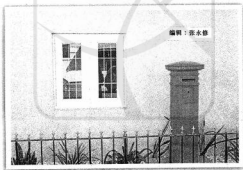
写这样的文字，说这样的话的人，是大学的教师或什么文学研究学人的心理和嘴巴吗？

啊！可恶的《独立后马华文学史概述》。

2009.8.14

副刊 南洋商报

编辑：张永德



2009年10月13日 星期二

南洋文艺



◎李锦宗 [文学钩沉]
照片提供/李锦宗

永别马华文坛的作家 近十年来

从1999年以来，表面上看来，已经逝世的马华作家似乎不多，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因为只有少数比较出名的作家，例如方北方、游川、征雁和姚拓等人的去世新闻才能在报章上刊出；几位作家，例如雨川和黄琼等人与世长辞之后，他们的家属在报纸上刊登讣告；一些作家，例如雨川、游川、芸亦尘和姚拓等人撒手人寰以后，文友在报刊上发表悼念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过世的消息就或多或少地传开了。

另外一些去世的作家，例如佩韦和游牧等人，他们的家人在报章的地方版上刊登讣告，一些文友在地方版上发表悼念文章，这只让某个地区的人看到，难怪其他地区则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些作家逝世之后，无声无息，罕为人所知，也不知道有没有寿终正寝的新闻抑或讣文，例如刘前度和张逸萍等人。因此，在这10年来，已经去世的马华作家其实为数不少，然而确实的数字却难以统计。

大多数的作家由于健康出现问题而患病，提前永别人间的，只有少数年迈无疾而终或者在意外事件中离世。

一般上，那些知名度较高的作家逝世之后，报章副刊和文学刊物都会为他们出版纪念特辑，例如方北方、游川、周川、征雁和姚拓等人。

然而，现有的马华文学组织似乎不习惯为那些较有成就和贡献的已故作家举办追悼会抑或盖棺论定的研讨会。

那些离开出生地远去的作家，例如刘郁（1914-1999）、杜运燮（1918-2002）、宋军（1922-2004）和韩蕻（1922-2007）等人以及那些跟马华文坛结过文学因缘的外来作家，例如谢冰莹（1906-2000）、杨际光（1925-2001）和马宁（1909-2001）等人，也在这段时期内离开人世。他们也为马华文坛做过一些事情，令人怀念。

这些永别的作家都曾竭尽所能，精心写出他们的作品，有的同时参与推动文学活动，他们为马华文坛所作出的贡献，不论多少，都值得珍惜的。那些在创作上才华横溢，有特出表现的，抑或是在马华文坛上有巨大贡献的，肯定会在文学史上名留千古。

以下是在2009年10月15日之前10年期间永别马华文坛的作家（如有欠缺，容后补遗）：



●姚拓



●李寿章



●江帆

[2009]

姚拓 (1922 - 2009)

原名姚天平，1957年移居马来西亚，历任《学生周报》和《南风月刊》主编及社长30余年。从1950年开始，即从事小说、散文和剧本的创作，著作等身，其中以散文集《美丽的童年》最为脍炙人口。他最后一部著作是自传式散文集《雪泥鸿爪》。

沈安琳 (1926 - 2009)

原名冯琦璋，战后南来，在柔佛州龙引和峇株巴辖等地的中学担任几十年的华文教师。她的作品以散文为主。1999年8月出版3部散文集：生活小品《自由的召唤》、旅游小品《难忘的旅程》和人物小品《一帘情话》。

李寿章 (1939 - 2009)

曾任新闻界记者20年，从事创作数十年，著有诗集《胶林恋歌》、《永恒的生

命》、《生活之旅》、《燃烧之歌》和《黑暗中的生命》以及诗文集《哀伤的日里河》和《取经的牺牲者》。他的诗歌创作讴歌祖国和人民的抗争和呼声，同时反映时代的面貌和苦难人民的心声。

江帆 (1927 - 2009)

本名吕少雄，1958年印行马来西亚联合邦独立后第一部诗集《创造之歌》，内容多属反殖意识甚高的诗歌。后来在国内时评上笔耕不断，著有《三年零八个月》、《时事风云》、《时事风云二》、《政工回首三十年》和《多此一报》等书。

佩韦 (1947 - 2009)

原名黄秀坤，南文会及峇株文艺协会财政。1984年开始投稿，创作散文、童诗，最擅长散文，曾荣获全国散文赛冠军等多个奖项，著有散文集《回忆拷贝》。



●方北方

[2008]

叶玉昭 (1949 - 2008)

曾以叶恬为笔名。她写微型小说、福音散文和专栏文章，著有散文集《既然是我》、《30%那边》和《十年抗癌不言败》。



●晴川

李一文 (1935 - 2008)

原名蔡存雄。受过英文中等教育。20世纪50年代，在砂拉越曾热衷于工运、文化事业，并积极参与争取独立的斗争。作品包括散文、小说和历史等等。著有小说集《青春在欢笑》，《津泉人物小传》，回忆录《生活·思想·道路》和《不让往事如烟》等书。



●晴川

黄戈二 (1936 - 2008)

原名黄国海，毕业于师资训练班后，一直从事华文教育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创作，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铁窗幕内》和散文集《铁窗幕》。



●朱昌云

符肇流 (1940 - 2008)

他的创作以诗歌为主。作品刊于本地各报刊，著有诗集《巴冬河之歌》（1975，1984年第2次印刷）、《围绕的红烛》（1981）、《剑与鲜花》（1992）和《菩提树》（1995）。

李定华 (? - 2008)

他曾在柔佛州担任华小校长多年，20世纪50年代写了不少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著有小说集《永远的期待》。

方北方 (1918-2007)

本名方作斌，大半生从事教育工作，一直到1990年荣休。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成立后，被推选为第一届副主席，第2届主席和第3届主席。他曾获“第一届马华文学奖”、第2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文学终身成就奖”。教余辛勤写作，主要的著作是小说，其中包括《嫩草与苔苔》、“风云三部曲”和“马来亚三部曲”。他也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和评论集。

芸亦尘 (1943 - 2007)

原名黄莺，曾在华小任教33年。从198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散文和新诗。她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描述抗日与社会伦理的长篇小说《渡越》和散文集《肝胆红尘》。

晴川 (1938 - 2007)

原名陈应德，马大文学博士，中文系副教授，1995年退休。他于1974年开始创作和翻译，著有诗集《迟开的玫瑰》，散文集《清风集》，社会评论集《吾爱吾乡·吾爱吾土》。他也擅翻译，曾把冰心的小诗集《春水》译成马来文(Air Musim Bunga)。

游川 (1953 - 2007)

原名林友泉，一生创作了400多首诗，其中部分诗歌选编为诗集《庄子》、《呕吐》、《国音》、《中国茶座煮米饭》、《血是一切真相》、《美国可乐中国佛》和《千年庄子》等书。他去世后，大将出版社为他出版《游川诗全集》、《游川式评论与纪念文集》和《江流如镜——游川诗手稿选集》等书。游川的诗歌是以朴素的手法、浅白的语言和诚实的态度，写出生活中活生生的事物。因此，他的诗歌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极富人间性及人情味，非常适合在“动地吟”朗诵。由他亲自朗诵的诗歌，效果往往令人震撼。

雨川 (1940 - 2007)

原名黄俊发，只受过中学二年级的教育，辍学后投身陶器业，1998年退休。1959年开始创作小说、散文和诗歌，已出版的著作计有中篇小说《生活的历程》、《苗长》、《河志》、《广福宫》和《沙河长流》以及小说集《埋葬了的鲜花》，《村之鼓》和《轮椅上的琴声》。他的小说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尽量以最新的手法描写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形形色色事件，力求创立自己的风格。

[2006]

萧冰 (1939 - 2006)

原名郑式侨 (华侨)，生前在吉兰丹巴西在爹经营盘碗店。棕榈出版社成员。著有《萧冰短篇》。他受到印度大作家泰戈尔的作品影响。他的小说一直都很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要互相关怀、互相爱护。

水沫 (1925 - 2006)

原名颜龙章，1994 年底离开教育的岗位。他擅写旧诗词、对联、新诗和散文。这些诗歌都跟历史事件和现实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他和部分人士的观点和愿望。他著有诗词专集《湖畔登音》和《龙吟雅韵》。

征雁 (1937 - 2006)

原名颜达人，最初从事小说创作，过后编写独幕剧，从此以戏剧作品在马新文坛上奠下重要和崇高的地位。他也写散文和评论，著有戏剧集《封锁线》、《夜渡》和《征雁剧作集》，散文集《后方的诗篇》，小说集《旁述》，中篇小说《升旗山下》以及剧集《在高天外看春秋》。

林潮 (1920-2006)

原名罗曾教，在教育界服务至退休。上个世纪 30 年代末期开始写作，作品以散文为主，散见各报刊，著有散文集《野火》和《燃烧集》。林潮的散文又可分为杂文、小品、随笔、散文诗，大多以素描的手法来创作，行文简洁，用字经济，写来朴实清新，情感丰富真挚，内容充满现实生活气息、社会意义和时代精神。

[2005]

黄润岳 (1921 - 2005)

早年毕业于重庆政治大学，来马居住 48 年，以教书为生，教余写作，著有多部著作，包括《英伦见闻》、《黄金时代》、《龙引 14 年》、《闻思录》、《虎生此旅》、《枫情琐记》、《丰盛之旅》和《思雨润岳》等书。

朱晋韶 (1922 ? - 2005)

生前长期在中国报撰写专栏，内容涵盖甚广，政经文教、生活保健、谈古论今，无所不谈，著有《朱晋韶》、《商海 40 年》、《大陆探亲记》、《孙子兵法今释今用》和《现代聊斋》等书。

周清曙 (1954 - 2005)

原名周联升，天蝎座诗社与神州诗社元老，擅长现代诗、散文及评论创作，曾与黄碧星（李宗舜）出版诗散合集《两岸灯火》及散文合集《岁月是忧欢的脸》。

卢惠敏 (1959 - 2005)

在诗巫修完小学课，在农场工作多年，过后加入教会工作。生前勤于创作散文，在砂拉越各报文艺副刊发表。她蒙主恩召之后，她的哥哥卢友雄为她出版了 3 部散文集《浪子回头金不换》、《爱有希望》和《让我们的眼睛明亮》。



[2004]

翠园 (1923 - 2004)

原名彭士驊，1950 年南來，任教于怡保霹靂女子中學，1954 年升任校長，1978 年退休。擅寫散文，著有《夜宿閑話》、《書燈絮語》、《校里乾坤》、《珍藏偶記》、《徘徊画廊》、《緣在山中》和《晚晴幽草》等書。

翻騰 (1949 - 2004)

原名黃仁華，擔任過小學教師和副校長以及作協理事和柔佛州聯委會主席，著有《白草的代價》和《希望的幻滅》。

方理 (1936 - 2004)

原名張慎修，1957 起從事中小學華文教育。擅寫散文和兒童科普文學，著有《美麗的彩虹》、《迟来的喜讯》和《童声飞扬》等書。

[2003]

何謹 (1959 - 2003)

原名陳和鏡，曾任《中國報》和《南洋商報》副刊主任以及《檳報》總編輯。常寫散文和專欄文字，著有散文集《一颺潮州鄉》和《平常心》，作品也收入散文合集《守候著鼓聲》和多部文學選集。

銘錦特 (1963 - 2003)

原名王錦曉。從 1978 年起，他開始創作一些各種體裁的作品，著有別集《白灰閣的回音》。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中期，他成立朋友出版社，為當時年輕的作者出版文藝書籍。

蔡洪钟 (1915-2003)

原名蔡钟英。他是砂拉越一位集文学、音乐和艺术于一身的艺术家。1941年离开中国到砂拉越任教。退休后，他在画室开课招生，同时不停作画，也不停写诗，著有诗集《海潮集》、《池畔集》与《壁像集》。

2002

刘子政 (1931-2002)

原名刘恭煌，在商余对砂拉越华族史料的搜集、保存、记录和流传作出极大的贡献，并致力于著述。从1952年迄今，已出版多部散文集和砂劳越历史著作。

游牧 (1936-2002)

原名游禄辉，假期师训班毕业后，投身教育界至退休。教余致力于文艺创作，著有小说集《生与死》、《那些过去的》和《演剧者》以及散文集《游牧散文》、《风尘录》和《云思集》。

朱昌云 (1933-2002)

他从香港新亚学院和澳门华南大学学成归来，长住怡保。他曾与人合编学术及文艺刊物《学源》，主编《新潮》和《建国日报·霹雳河畔》。他在50年代末期开始写有关旧诗词的文章以及专栏和散文，著有书信集《书函寄语》和《书函寄语二集》以及人物评论集《人物随谈》、《人物随谈二集》和《诗词人述评》。

[2001]

黄福溪 (1919 ? -2001)

怡保养晦书室主人，生前热心于社会文化工作，教授古文逾50年，对诗文和书法融嗜成癖，著有锺光庐乔梓诗文集《报堂兴替语山城》和岭南三家诗文集《三国演义人物述评》。

[2000]

张逸萍 (1926-2000 ?)

原名张奕东，台湾师大毕业，曾任中学教师 and 师训班讲师，教余投身于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著有小说集《希望》和散文集《重逢不如怀念》。

[1999]

原上草 (1923-1999)

原名古德贤。1978年出任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第一届主席。1998年荣获第五届马华文学奖。1941年开始写作，著有小说集《韭菜花开》、《诗人方如梦》、《房客》、《迷途》、《水东流》、《乱世儿女》、《风雨榴槤坑》以及散文集《万家灯火》和《原上草散文选》等等。

勘安 (1919-1999)

原名谢名平，1953年来，曾在美里、泗里街和汶莱执教。著有散文集《脚印》和《勘安小品》以及小说集《蜕变》和《大蓝图》。他的遗著《谢名平文集》由美里笔会出版。

斐楼 (1900-1999)

原名匡光昭，从事教育工作。1969年退休后，勤于创作散文、小说和旧诗词，著有《斐楼文集》。

文彪 (1914-1999)

原名李文彪，1936年南来，曾任教师，后来在森美兰州晏斗经营洋货店，一向对写作极有兴趣，作品以散文和评论为主，著有《水游传杂谈》和《凡鸟凤凰烽烟时代》，并与儿子李雄建合著《两代集》。

黄琼 (1925?-1999?)

原名黄月娟，1949年南来，在麻坡和吉打州的中学执教，1980年退休。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创作了不少的短篇小说，后来选出部分作品，编成小说集《杏花时节》。

2009年10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许永松



南洋文艺

南洋文艺

13年回顾

张光达，1965年生于吉打州，祖籍福建同安，马大工程系学士。著有评论集《风雨中的一枝笔》，与张永修、林春美合编评论集《惊味马华文学》。



编者：你自 1995 年开始，每年都为《南洋文艺》撰写年度回顾，前后长达 13 年。请说说《南洋文艺》在这 13 年来的变化。

张光达：基本上来说《南洋文艺》从 1990 年代初的过度依赖作家的创作发表到后来的注重编辑规划和专题策划，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成绩。尤其近年来编辑策划的“极限篇展”及发表为数不少的“文学观点”评述文字，这些副刊文体的形式文章可算已经确立了成型厘了马华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侧面，也形成了新世纪马华文学某种文学趋势现象的焦点，促成文学阅读消费走向的变迁，在其中若干诗人作家的崛起皆为实例。因此要剖析 1990 年代以来的马华文学，《南洋文艺》势必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或依据。另外报纸的消费性格，还有副刊版位篇幅的局限，《南洋文艺》近来少刊登篇幅长结构严谨的学术文章，较注重精简短小的文字，虽是报纸文艺副刊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此现象也揭示了马华文学发展的另一种挑战。

编者：在这期间《南洋文艺》出现了哪些比较特出的作者？

张光达：近年来《南洋文艺》上我印象较深刻的是每年一度的“年度文人特辑”，都办得很不错。编者对所选的作家都有一番深入的认识，而且对个别作家或个别文类也不独沽一味，其中一些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久违的女作家方毓真、林若隐等人的特辑，涵盖了作家的作品、访问和对作家其人其文的评述，做得很周全。其他一些很成功的特辑有“以诗抗战”、“非典型诗展”、“出土文学”、“我的文学路”、“我最喜欢的作家”；“极限篇展”也颇有建树。尤其是在编者积极推动极限篇之下，成功带动起编者与作者的互动，其中诗人沙河以“勿勿”的身分成为这个文类书写的佼佼者。

编者：你心目中的文艺版是怎样的？

张光达：在马来西亚，中文报纸的副刊——尤其是文艺副刊，形成一个很特别的传统，既是报业传播文艺思想的一部分，也是文坛结构的一部分，它对于马华文学的长远发展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国内两大报的文艺副刊如《南洋文艺》、《文艺春秋》的影响力，可能已经超越了马华文学杂志或马华文艺刊物的地位，甚至毫不夸张的说，长久以来它已经取代了马华文艺团体、出版界和文学杂志的功能，它成功整合了马华重要作家、文坛、文艺编辑和广大的（文学）读者群。

马华文学在马来西亚的边缘处境，而文艺作品在以商业大众为导向的报纸中又可谓边缘性格，然而，透过作家在副刊发表作品，副刊编辑执行者规划引导文艺理念，以及文学读者群对这些作品或论述的吸纳和接收流传，却形成一个很独特的“副刊文化”。如果说在马来西亚，办中文报是对肩负华人文化传承的基本责任，那么可以说编文艺副刊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建树也具有同等的责任。马华作家当然不一定要透过文艺副刊来发表作品，但是以文学传播的管道或文学读者群的数量来说，报纸的文艺副刊无疑的是占有最大的优势，它不仅是对读者的阅读口味造成影响，还包括作者的书写关怀格局与文坛议题走向形成深远的影响，最终形成副刊与文坛的互动现象，型塑了文学生态的秩序和面貌，于是，副刊的编辑执行者的文艺理念和方针起着重要的一环，因此，我认为理想的副刊文化应该是上述作家、编辑与读者能够形成互动，来带动整合马华文学格局，或造成一股生气蓬勃的文坛趋势现象。

15 JUL. 2008

政治变化下的 马华文学

◎谢诗坚 文学观点

我没有想到由韩江学院中文系主办、杭州教育局协办的《中文写作希望工程》（每个星期一天，为期一个月）会有这么热烈的反应。原先预算不超过100人，后来竟增加到160名，由于场地所限，后来者只好割爱。这种对中文写作的热爱令人感动，而6位知名作家应邀担任讲师也加强号召力；尤其难得的是在国中教华文的老教师都加入其中，对马华文学的推动，肯定会大有帮助。

说到“马华文学”，我也在4月15日开幕礼上凑一份热闹。我以《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为题阐述了马华新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所谓“马华新文学”乃指1919年“五四”运动后带来的白话华文文学，具有新思想带动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新文化。从1920年起至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为止的25年中，马华文学的主要推动者是来自中国的文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郁达夫和胡愈之（沙平）。有学者作过统计，从1919年到1949年为止，南来作家共159名，几乎在马华文坛领尽风骚。这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是

南来的作者开辟了“马华文学”。他们也跟着中国文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五四”后的10年是力倡“文学革命”，下来就转成革命文学。我将之称为从胡适时代转成郭沫若时代，而马华文坛则将“革命文学”称之为“新兴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1937年抗日抗战之后，不论是中国或马新两地，都归到统战而出现了“战时文学”或“抗战文学”，两者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

1945年战后，中国文学进一步向左转，而有了“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文艺理论由此建立。马华文学则力争“破茧而出”，因而有了1947-1948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争。但不变的是，马新左派统战夺得了主导权，而将马华文学导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也就出现中国和马华文学绑在同一棵树上，继续走“革命文学”的道路。这可以以1953年新加坡掀起的反黄运动作为一个新起点，土生土长的作家逐渐取代了南来作者的地位，马华左翼文学的地位在政治洪流底下得到巩固和强化。

但在另一方面，1955年又兴起另一股思潮的文学是由《学生周报》和《蕉风》带进的。最初的主编是方天（张海威），也就是在1934-1936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张国焘的儿子。它被左派视为右派的刊物，而不得不在1957年转移阵地，在吉隆坡立足和发展。此时的主编已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作家姚拓。



这种左右派的文艺思想斗争牵动马华文学整整 20 年有余（1955-1976 年），而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左翼退出马华文学作为一个句号。对于这段时期（1926-1976）的整整半个世纪，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有如下的评语：不论你喜欢与否，这 50 年的马华文学是左翼文学在主导，也属于“革命文学”。在这之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慢慢化解对峙而产生两者的融合。这种融合意味着文学与政治脱轨，而走向多样化的发展。

尽管我们在今天一直强调马华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或台湾文学，但因为同文同种和血脉相流，又出现新的连系。表现最特出的莫过于马华作者以在台湾获奖或在台湾扬名；相同的，今天的马华作者也以著作能在中国出版或受到表扬为傲，也似乎惟有这样，才能确定本身在马华文坛的崇高地位。

当时代在变化，我们又看到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马中台）在相互演绎马华文学的地位，政治已经远离文学；文学也适应了当代的国际政治生态。这意味着政治大气候正引领马华文学融入国际社会中。

13.05.2006



2006年9月16日●星期六 D12

文学 与政治

——战前战后的郁达夫、
胡愈之及金枝芒

◎谢诗坚 文学观点

16.09.2006

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中共喉舌报，战后的胡愈之爱国心切，号召青年回中国参加解放战争，面对了一场持续半年的笔战。对方是马共一枝笔金枝芒。这场笔战可以演绎为“中共与马共在文艺上的交锋”。

9月2日，韩江学院中文系及华人文化馆迎来了8位学者：许通元、林春美、许文荣、

王修捷、张光达、陈志鸿、庄华兴及张惠恩为当地爱好文学者举办一场文学研讨会，我在当天以《文学与政治》为题，作了开幕致词。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庄华兴提交的论文引发的。他以金枝芒的小说探讨马华左翼文学作者走过的道路，间中带出金枝芒这位文学家“战斗的一生”。

这是我第3次听到一位文学批评工作者提及金枝芒在战前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一位是文史学家方修形容金枝芒在抗日时期的作品偏向于当地的救亡运动，而成为一位代表性人物。

第二位是日本学者不二原夫 (Fujio Hara) 向我说 (2003年)，在马华作家群中，金枝芒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庄华兴则是第3位针对金枝芒的创作切入他的经历和写作技巧。就我所知，金枝芒是在战前和战后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马华左翼作家。他的生平更是充满神奇色彩。根据庄华兴的研究和我所掌握的资料，金枝芒是一位不弃笔从戎的战士。他在1912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的常熟县，早年在中国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曾受过师范教育，喜欢撰文弄墨。1936年，与师范女生周文琴结婚，生下儿子承赞后，就交托岳母扶养。且在同年应聘偕夫人来到露露雪亚冷的同汉华文小学执教（这个地区是马共当时的据点之一），并开始向报章投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日进入全面的战争，刺激了金枝芒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大力唤醒全民抗日，因而介入了马共领导的文化界的公开活动。初期的作品，都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与汉奸的嘴脸。到了1938年后，开始以本地题材描述工人的苦难生活。如〈八九百个〉、〈弗琅工〉及〈采锡矿工人〉等等。显示其笔调已告转型，侧重当地的题材进行创作。

1942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他参加了马共地下组织“抗日同盟会”。1943年在农民群众中生活时，他加入马共。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金枝芒投身左派报章服务，包括《战友报》及《民声报》。

1948年，他挑起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战，对手是中国南来的知名作家胡愈之（胡愈之著《西行漫记》（2万5千里长征）《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译者之一）。他主要是不满胡号召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并指胡搞“侨民文艺”，因而反对“手执报纸，眼望天外”的创作态度，要求停止把“马华文艺”变成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提倡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这场意义深远的笔战揭示了金枝芒要马华作者写本地题材，不要再鼓励年轻人回中国了，也不要再搞“侨民文艺”了。而胡愈之也不甘示弱，为文反驳，最后是夏衍和狄龙打圆场，不了了之。我们同意黄锦树所说的这不是一场文学论战，而是包含复杂性的因素在内。

其实，两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以“革命文学”作为主轴，但由于胡是中共在海外的代言人，而金是马共的代言人，也就涉及不同场域和不同要求的论争。前者号召华侨回国服务，后者主张华侨留下来参加解放斗争。

1948年中实施紧急法令后，金就转入地下参加游击队抗英斗争，而胡愈之也就回中国接受新任务。

在这里，我以庄华兴的论文所提及的事件和我的资料再串出战前和战后的著名文人的心路历程。

1. 金枝芒（1912-1988）是在1936年南来，及后参加马共活动，把全部精力用在本土的斗争。一直到1961年才秘密地随陈平离开马泰边境，进入中国。自此之后他便留在中国搞马共的活动，未再回到马来西亚。1988年逝世于北京。从1948年到1960年，他在马泰边境生活中未停过笔，也有创作不断发表。即使人到中国后，也有政治性的创作发表在马共电台。

金枝芒原名陈树英，其他著名的笔名有孔婴、股枝阳、周容、老陆等，加入马共时以“周力”为名。

2. 郁达夫（1896-1945）是于1938年应聘到《星洲日报》担任文艺版主编，翌年又成为《星洲日报》文艺版主编。虽然比金迟两年来马断从事文艺活动，但却是第一位南来的著名中国作家与马共一枝笔的黄耶鲁进行笔战。

事缘郁达夫在1939年在檳城发表了有关文艺的问

题时被认为“得罪了”本地文艺工作者，因而引起耶鲁（当时在《光华日报》担任翻译工作）为文反驳，指郁对鲁迅不敬，并且要本地青年多读书，整天关起门来写，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这场论战后，郁达夫更是谨慎其言，也说了一些好话来消除“误解”。此时他也了解到马新的文化人不是不开化的，水平也不遑多让。

耶鲁在后来即是成为新加坡名人的黄望青，也已在数年前逝世。

在抗日的年代，郁达夫的创作偏向政论，时评和文学批评。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安，文学创作，如小说似乎留白。但据统计，郁达夫在新加坡3年，写过了四百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等文章，诗歌有五十多首（夏衍语）。对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文化上作出巨大的贡献。不能说他没有创作，只因时局所需才转笔调。

1942年，郁达夫逃亡苏岛避难，不幸在1945年被日军杀害，客死异乡。综观其一生可以用其诗豪概括，早年的他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1931），而晚年的他是“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3. 胡愈之（1896-1986），早年在中国文化界活动，30年代是“左联”重要成员。1937年联合译出版《西行漫记》外，也出版了《鲁迅全集》。（1945）虽然他公开的身分是民盟领导人，但他在1933年已秘密加入中共。

1940年，经周恩来推荐，胡愈之应聘来到《南洋商报》，出任主编。由于他有使命在身，言行十分谨慎，不似郁达夫浪漫情怀，口没遮拦，拒敌笔战。

这就是说，胡愈之较全校芒逃4年南来。

《南洋商报》的编务在胡愈之的主持下，大有进展，成为抗日时期的一份出色的华文日报，一年之内报份激增。不幸日本南侵，他们被迫与郁达夫等人逃南苏岛。陈嘉庚也在其中。

胡愈之在马新期间（南侵前）的两大贡献是：支持陈嘉庚“南侨总会”的抗日，为文力挺陈嘉庚；拉拔郁达夫成为抗日的文化先锋，担任“星华文化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团长，而胡自任副团长。

虽然胡愈之坦承他与郁达夫在政见上有不同，但郁的爱国情操和抗日决心是令他敬仰的。他们的友情也就在抗战的年代建立起来。从他写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来看，流露了真情，是一篇精彩的散文。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愈之再回到新加坡，遗憾的是郁达夫已遇害，再也回不来了，可谓天妒英才。翌年，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中共喉舌报，正是战后的胡愈之爱国心切，号召青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也像郁达夫一样，面对了一场持续半年的笔战。对方同样是马共一枝笔金枝芒（他取代覃鲁的地位，成为马共一枝笔。覃鲁在抗日时于1943年被捕，较后已脱离马共组织）。这场笔战可以演绎为“中共与马共在文艺上的交锋”。

巧合的是，1948年是两人生涯的转折点，一个走入地下，一个回中国参加建国。而胡愈之留下的《南侨日报》则交给其挚友洪丝丝主持。1950年《南侨日报》被英军查封，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也回中国了。

与此同时，胡愈之也影响陈嘉庚决心回中国定居。

从3位文人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他们的共同与同点，又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不尽相同的。

除了英年早逝的郁达夫（49岁）或因避难而未能接触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著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左翼文艺理论拍板）外，胡愈之与金枝芒都是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鼓吹者，这判定了他们的文学路线是与政治路线同步进行的。换句话说，政治主导了文学，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才使文艺从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不论是金枝芒，胡愈之和郁达夫及其他同路人，我们都看到政治干预了文学。

到了1980年后，中国在邓小平的主政下，宣布政治不再干预文学，而马华文学也与政治脱钩了。

虽然我们认同政治不能干预文学，但反过来，文人在今天，可以通过他们的一枝笔，用文学影响及反映政治，乃至在必要时“干预”政治，如同政论批评者对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以便政治变得健康和更能关怀人文生活。

16.09.2006

南洋文艺

【出土文学】系列之 金枝芒特辑①

在历史与文本 之间摆荡

论金枝芒的 抗英战争小说

文学观点 ● 庄华兴

金枝芒的左倾思想以及介入马来西亚独立斗争之深让他真正预知了马来西亚政治气候的改变，加速催生他的本土情怀。这也突出了他与其他南来作者的不同。更进一步说，在以他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斗争之中，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意识的萌芽。

在马华文学史上，金枝芒是一个身分特殊的人物。1942年新马沦陷以前，他曾在霹雳督

冷(Tualang)同汉文小学执教，一边从事写作，鼓吹抗日；日军撤离之后，他先后在怡保和吉隆坡的报社供职，并参与（更确切说是引爆）了马华文学史上—场重要的文艺论争——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这时候他已经是马来亚共产党党员。1948年6月20日，英殖民政府为了挽救与重振其殖民政权，颁布紧急法令，决心消灭民族抵抗势力。金枝芒在事发前夕潜入森林，拿起枪杆，以实际行动投入抗英解放战争。这时候，他已是个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者。在战前马华南来作家当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多见。从他走过的道路，结合他的言论，我们可以感知他突出的斗争理念以及贯彻始终的斗争风骨，说他是一个胆识过人的马华知识分子亦不为过。他的左倾思想以及介入马来亚独立斗争之深让他真正预知了马来亚政治气候的改变，加速催生他的本土情怀，这也突出了他与其他南来作者的不同。更进一步说，在以为他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斗争之中，我们看到了马来亚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滥觞。然而，由西方学有支配或与本土权力宰制机关共谋的马来亚史学界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马华文史学界或因为政治禁忌（自我设限？），不敢苟同他激越的本土化主张而选择以阙遗待补的方式处理金这一号人物，徒使议题更形隐晦（讳），亦为往后的马华左翼文学研究预设重重障碍。

当阶级斗争碰上民族主义

《抗日战争小说选》（下称“小说选”）共收3个中篇，计《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顶》和《甘榜勿隆》，分别描述了马共成员如何结合原住民、华人和马来人的力量联合抗英的故事。3篇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甘榜勿隆》。它固然可视为共产党对马来群众的招揽策略——透过真诚打动马来农民的心，亦间接揭示其欲建立跨族群无产阶级社会的愿景。

甘榜勿隆（Kampung Belum）是霹雳河上游一个偏远的马来村落，村民纯朴、热情，但耕地和果园被英军和土匪、恶霸摧毁，农作物被抢夺，妇女惨遭蹂躏，原

本平静的村子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共产党人极力安抚村民，终赢得马来群众的信任。在协助村民开垦芭地，重建家园之际，作者对乡土作了如下美好的勾勒，除了体现作者浓厚的乡土情怀，亦透露左翼斗争对土地改革的愿景：

一眼望去，一个个小甘榜之间是一片片的果园，果园里结满了椰子、榴梿、香蕉和一些别的生果；长条的水芭，前面长得绿油油的，像二条绵延不绝的绿色带子一样，顺在静静地流着的勿隆河水的两边；而在更远处和更高些山坡上，是一块块的早芭谷。现在，这些早芭谷已经成熟了，一阵微风吹来，一片片的谷浪上闪烁着金黄的颜色。在这些金黄色的谷浪之间，芭蕉早已开了花，结了子，五颜六色的芭蕉须在风中飘动着；金瓜苗蔓延在地上，甘蔗林崛起在远畔。什么都在生长，什么都在成熟，什么都像幸福之神在向你招手啊！（金枝芒，2004：260，下划线网）

作为左翼作家，阶级平等是终极目标。因此在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民族主义相形之下变成了可以轻易化解的问题。金枝芒的抗英小说不无如此倾向。因此，在《甘榜勿隆》，我们看到其时马来民族问题并不从切实的角度进行描述，而是置于阶级斗争的天平上寻求解决。譬如在冲突事件中，金枝芒就表达了他对种族关系一厢情愿的乐观：

有一个同志，父亲在抗日战争后期，死于排华党徒之手，他自己在1950年死里逃生，他也像别的同志一样，在马来甘榜好好工作，可是心里总是不太相信马来人会起来革命，能和华人同志相处如一家人。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说：“是我错了！”（256）

种族冲突固然是日军、英殖民政府和土匪恶霸埋下的种子，然而，在解除马来民族长期受压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是否透过社会主义斗争比民族主义斗争更直接有效呢？在遵循社会主义路线公开向殖民主义抗争与向殖民主义叛徒夺先机取得政权之间，显然的，马来人选择了后者。回顾战后初期的马来亚历史，马来人受殖民统治四百余年，无论在政治、经济与宗教各方面饱经蹂躏，潜在的民族

主义情绪犹如蓄势待发的火山。加之日军极力鼓动仇华情绪以及英殖民政府长期实行的分治政策，还有战时横行无道的华裔土厘更加深了民族间的歧见，因而种族摩擦与冲突事件时有所闻。但是，共产党人并未认清这个事实，战略上又深受北京影响，使被殖民者把柄（大力宣扬共产党为华人恐怖组织，并诬指马共是中国的第五纵队），最终成无以弥补的大错，也让新村华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种族矛盾固然是客观历史因素所致，但在内部民族间的矛盾未获得疏解之前即矛头向外，实在是对问题本质的误读/判。在《甘榜勿隆》中，这些都间接揭示出来。

然而，若换个角度，我们发现金这篇作品相当真实地再现了马来民族的思想、风俗习惯与生活禁忌。譬如马来人行割礼、对猫的特殊感情等等的描述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金和整体共产党人的认同状况，即便在今天，很多华人对友族相关生活细节都不甚了了。可见，一个人的思想意识没有经历一定程度的转折与内化是绝对写不出那样的作品。四洲金在文艺独特性论争时期提出的纲领性宣言，我们发现他的理念和行动确实并行不悖。为了贯彻个人理念，他敢于跨界进入马来人的生活领域，进行描绘与概括，成为一名积极的实践主义者。他善于把党人对马来西亚地理形势的掌握融入小说里，无论叙述说理，结构安排，都非常老练。且看《甘榜勿隆》之起笔：

霹雳河，发源于吉兰丹和霹雳北部交界的崇山峻岭间，沿着马来边境而北行不远，收容了一些支流，然后转头向南，浩浩荡荡流贯霹雳州，注入马六甲海峡。（183）

这种高度概括而又生动的描述没有娴熟的地地知识根本不容易做到，在同时期（50年代中晚期）所谓爱国主义文学中亦无法看到。在题材取择上，他写自己所熟悉的。他写阿沙（Orang Asai，原住民之意）和马来人，却不见他写印度人，虽然部队里也有印裔同志，可见他对“突入现实”的主张还是相当谨慎的。此外，其爱恨分明、嫉恶如仇、刚直不屈的精神，从他作品中异常突出的叙事者声音中可以轻易感知。

（1，待续）

13.08.2005

当历史走入文本之后

就内部因素而言，小说选最引人瞩目的还是作者的语言特色。客语方言在3篇小说中相当普遍，尤以《烽火中的牙拉顶》为最，即便篇名“牙拉顶”，也是马来地名的客语转译。无疑的，这些乡音野音在小说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感染作用。它的形象以及粗犷性赋予语言的力度、草根性、亲和性等等不是一般的规范汉语所能比拟。我们读李永平的《吉陵春秋》，这种感觉也一再浮现。否则，很难想象以李永平非北方中原籍背景将如何经营他笔下那些人物与题材。当然，一般民俗学家多把客家发祥地追溯到中原与江淮一带，但那毕竟是遥远的事，与二重边缘化（祖籍中国南方广东揭阳以及生身之地——中国南方以南的婆罗洲古晋）的李永平没什么关系。然而，我感兴趣的是，无论金枝芒或李永平，相对于正统的汉语/中文，其客语方言在小说中究竟居于什么位置？它跟汉语的关系如何，以及这种关系又如何再现——平衡文本思维世界与现实权力的关系？如果方言是作家的母语，那么正统中文岂不成了父文，一种有待批判的位置与权力象征？果真如此，我们就不得不正视方言应用的深层意义了。而金枝芒在战后初期那场论争中急欲与中国划清界限的用心至此也算有了眉目。界限是建立在主体意识之上，虽然它让人联想到本土性。但我们以为这不应

该是个问题。作为安土重迁观念下的文化存在样态，马华文学总不能永不着地，或永续漂泊-离散；而上了岸以后，总要走路。借卢卡契的话，便是“航行结束，道路开始”。金枝芒的实践便是开道，后人愿意不愿意续走下去，或另辟蹊径，都无所谓，重要的是那是一条向内纵深开发的陆路，不再是祖辈曾经走过的水路，借金枝芒的话，就是“手执报纸，眼望天外”。

金枝芒的主体性认知在他的小说文本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佐证——父文母语的分工、交融，甚至对峙与抗衡，由此终于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结构。当然，其独特性自是不见容于精纯中文的。但回头想想，杂质中文（这不能等同于破中文）也没什么不妥，它反而让我们认清中文的不限与局限，以及纯粹性语言与思想意识的互通与共谋。当年中国大陆刚对外开放时，我们读中国大陆书籍那种强烈的隔阂感不仅源自那全新的语言习惯，更多的是其意识形态修辞使然，但往后看多了竟也“没了感觉”。

虽然相隔近半个世纪，但今天我们读金枝芒的作品，那种隔阂感却不存在。关键是我们和金处于一个类似的时代。金南来后即融入本土，而我们拜环境化趋势所赐以及网络通行之便，亦接上祖辈故土不久。因此，我们对金的小说语言并不陌生，那种因时空交替的错置而产生的熟悉感，让我们轻易地就能进入了金的语言世界。兹拈数例，请注意阅读

和华文或方言俗语的交合，以及用语的鲜活：

1、这一天，我和金祥同志是躲在娘娘山上的，原想在那里一枪狙击一个敌人，可是，敌兵太多了，娘娘山又不过是一个孤山，白天开了枪给敌人搜索上来，是插了翅膀也飞不走的，于是我们等着晚上来做它的世界。(99)

2、牙拉顶的群众是吃过了敌人的不少苦头的，他们害怕再发生不幸的惨事，所以把东西交给民运同志的时候，千叮万嘱的说：“千祈不好写下我的名字呀！”(153)

3、可怜的甘榜勿隆的农民，经过一年的日晒雨淋的劳碌，像种佛那么的供奉那批人十夫八天之后，就再也不能不饿肚子了。(186)

4、插了藤又像人们尖藤一样，用一条条的尖木当作楔子尖下去。可怜这些早老的妇女，一再昏死过去。(190)

5、椰树底下已经长起了浓密的藤青，快要变成大芭了，这就使椰树得不到足够的肥料，椰子越打越小。越打越小了。(248)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有些仅仅是客语词汇的嫁接，有者则不是单纯的词汇嫁接可以解

释，譬如第一例便是。但我们仍然要问：金为什么选择/保留客语或方言？部队里的通行语——客语或许是关键因素。马共在创党之初，党员以漳籍和客籍人士居多，后来广西籍也不少。由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漳客两籍饱受殖民政府剥削，因而倾向诉诸革命手段。不难想象，金枝芒的读者正是这些同志以及大部分在森林边缘务农的客家群众与民运成员。小说语言的浅白和平民化正是建立在这个群众/社会基础上的。

(2，待续)



金枝芒摄于1961

13.08.2005



16.08.2005

作为一种功能文学 (Functional Literature)，金枝芒这些作品

无非具有非常强烈的煽动性，尤见于其对语言的操控、情节安排与细节处理之上。当然，这与革命文学的任务是一致的。煽动性注重情绪操纵，以达到写作目的。(甘榜勿隆) 有下列这么一个例子：

甘榜勿隆在开辟的时候，以及在开辟的初期，是完全依靠劳动农民自己的血汗的。殖民统治者不但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甚至连有了一个甘榜勿隆它都不知道。但是，其后当知道在勿隆河边有了甘榜了，就马上来建立它的殖民政权。这种殖民政权非常突出地表现了英帝殖民统治的本质。它除了榨取剥削以外，自始至终没有给甘榜勿隆人民丝毫的好处，甚至没有在甘榜勿隆做过任何一件即便是旨在欺骗人民的福利事业。这种剥削是残酷的，赤裸裸的一丝不挂的。(185)

在《烽火中牙拉顶》，相类的叙述亦相当有感染力：

年轻的妇女要强奸，四、五十岁的老太婆要强奸；月经来潮的妇女也一样要强奸，甚至，强奸后再得一身满手是血了，就嘻嘻哈哈地到河中去洗。同志们，请你们回答我：“这是不是连禽兽都不如的东西！”

在叙事层面，3篇作品都是以共产党人的叙事角度铺陈，明显的，叙述 (tell) 多演示 (show) 少，因此免不了予人一种过度操控叙事的感觉。证之 3 篇作品，故事中群众的百貌并不明晰，内心的描述更付之阙如。易言之，作者对群众的深描几乎空白，除了在《烽火中的牙拉顶》对阿云娘的描写比较生动、突出以外，其他都是沉默的一群。可以说，作者在塑造典型人物方面交了白卷，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左翼-普罗文学所强调的整体

性仍不免有一段距离。我以为，如果作者能从群众的角度铺陈叙事，小说的感染力当更强烈，相应的，艺术性也自然提升了。据此多少让我们看到左翼斗争失败的可能因素。马共的武装斗争一方面非常仰赖群众的支持（包括情报、物资、药品、粮食等各方面），但对群众心理的掌握却非常欠缺，因而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自然就显得略为保守，或缺乏弹性。此外，华人在经历了日据时期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后，普遍上都渴望过和平、安定的日子。他们对殖民主义者的剥削或迫害纵有不满和灰恨，然而，是否都毫不保留，认同武装斗争策略呢？另一方面，马共的武装斗争受历史情势与人为因素所迫，终战无期，与独立前相比，其斗争离群众愈远，凡此种种在金枝芒的小说结构、读者对象与小说视野上都有轨迹可寻。

小结

金枝芒在参与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时曾强调从“此时此地”摄取题材，证之于他的抗英小说，他的确作了一个良好的示范。在《甘榜勿隆》，更体现了他对马来民族风俗的熟稔，写来自然而引人入胜，没有丝毫造作。这自然是拜他对周遭事物敏锐、细致的观察所致，间接也揭示他对斯土深厚的感情。作为马华文学之一员，金的抗英战争小说堪称左翼文学的代表作。他对现实的逼视，对理念的一以贯之都是写实主义的一个典范。就历史层面而言，抗英小说不仅唤醒了大马华族被迫遗忘的集体记忆，也是对历史真相一个最有力的反证。

此文行将收笔时读到马来退伍军人强烈抗议陈平及其追随者入惠法庭要求准许回国定居的新闻，随之有关方面宣布即将在主流媒体播放马共“恐怖行为”的纪录片片断，以及吉兰丹彭哥兰仄巴第八步兵旅于3月14日推出史著《双溪斯摩战役》（Pertempuran Sungai Samur），明显地是要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回在欧罗斯摩战役中大败的诠释权。之前新闻部属当权人物兼前锋报前总编辑更在紧接在《陈平——我方的历史》之后推出他在报章上发表的时评兼，其中几篇明枪暗箭针对马共，看来有关方面的文宣攻势已揭开序幕。一个新兴国家在建国史的诠释在独立后近半个世纪后才正式浮上台面，可以想见之前的言论宰制之一斑。由是观之，金枝芒的抗英战争小说就显得特别有意思。它不仅为文本找到坚实的言说基础，更为活在当下的人们提供另一个历史参照系。

历史终于苏醒，在争相说话了，读者还能沉睡吗？

参考文献：

陈平口述；伊恩沃德、诺玛来拉佛路尔撰；方山等译（2004）《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金枝芒著，方山编（2004）《人民文学家金枝芒抗英战争小说选》。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

庄华兴（2004）《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主体性论述的开展及其本质》。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主办，2004年台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讨会论文。

Short, Anthony H., "Nationalism and Emergency in Malaya" in Michael Leifered. (1970).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Evolution in South-east Asia. U.S: Centre for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注释：

3 篇作品虽融合了金枝芒的个人亲身经历，但情势结构大都结合部队战士的笔记与口述，再由金整理编辑，可说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左翼文学对整体性（totality）的要求——不仅仅是客观历史的整体性，也是主观行将的整体性。

按方山先生接受访问表示，马共的文艺观基本上是结合了浪漫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与刻板照相式写实不同。他举金枝芒的长篇《饥饿》为例，虽然小说结尾如实地描述了当时部队自丹晚边区朝马六甲迁徙时面对饥饿与官兵迫害等种种惨况，深刻打击整体士气，但在 70 年代内部的新方针之下，金的处理方式被认为与新现实主义路线相抵触，不免被提出检讨。金认同党内意见，但由于事忙，特请中国大陆著名作家朋友协助修订，结果本土特色尽失，金后来亲自修订。故《饥饿》至少有两个版本。

（3，续完）

2005 年 8 月 16 日 ● 星期二

文学观点 ○ 庄华兴

南洋文艺

编辑：阮永修



金枝芒系年

整理/庄华兴

原名：	陈树英
笔名：	陈英树、乳婴、殷枝阳、金枝芒、周容、周力、老陆等
1912	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常熟县。
1936	与荷苑女生周文琴结婚，生儿承赞，交托岳母抚养，与夫人抵达新加坡，再北上露露督亚冷同汉华小任教，并开始在校章杂志写文章。
1942	任职于锡矿场铁船机器修理部，同时参加抗日同盟会（地下组织）。
1943	离开锡矿场，转到露露黑水港一带，开荒种植旱稻、木薯等。这时期加入马来亚共产党。
1945年8月 至1946年	任马共《北马导报》和《怡保日报》编辑。
1946	《怡保日报》被查封，率调南下吉隆坡任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机关报《战友报》编辑，兼任《民声报》副刊编辑。
26/12/1947	在《战友报》新年特刊以笔名周容发表《谈马华文艺》一文，反驳以胡愈之为首的民盟-侨民派，引发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论争，历时半年左右。
1948年8月	属激派令颁布前夕转入地下，被组织调往彭亨，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的抗英武装斗争，先后参加《战斗报》、《团结报》和《火线上》编辑与出版工作。
1958	主持战斗故事丛书《十年》编写和出版工作。
1959 杪	以中央根据地自丹吐边区北迁马泰边境为故事背景，同时参考部队老兵的笔记与口述，写成长篇小说《饥饿》，由火炬出版社油印出版，署名老陆。
1960	《饥饿》再次由檳吉坡北星社油印出版。
1961	执行组织委托的任务，途经越南前往中国，于是年年杪抵达北京。
1968	赴湖南筹备设立《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
15/11/1968	任职《马来亚革命之声》中文部主编。期间，写成多部中、短篇小说，亦曾在《诗刊》等发表诗文。《华语马来语对译简明词典》（手抄打字本）也在这期间编篡完毕。

1979

妻子周文琴获准赴中国大陆探亲，与妻久别重逢。

30/6/1981

革命之声电台结束，担任马共中央海外代表团秘书。

28/1/1988

心脏病发，逝世于北京医院。留下遗孀与三男一女。

2001

长篇小说《饥饿》原订由香港南岛出版社再版，未成。

2004

吉隆坡 21 世纪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家金枝芒抗战战争小说选》，收《智夹夹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顶》和《甘榜勿隆》3 个中篇，主编方山。



金枝芒(1912-1988)

【出土文学】系列之 金枝芒特辑②



《烽火中的牙拉顶》

第十章 妇女

经过了敌人的几次血洗之后，牙拉顶剩下的男子已经不多见了。现在是妇女和老汉们挑起一家的担子，牙拉顶多的是孤儿寡妇了！

老人和妇女早晨出门做工，到傍晚回到寨中营，起初中午还能带一点饭，后来就只能带点茶水了。从寨中营到田芭，要步整整半路，早出晚归，也做不到几多工作，何况是老人和妇女。

有一个妇女，我们现在姑且叫她阿云娘，丈夫被敌人抓去了，有4、5个会吃不会做的儿女。她牵着牛，带着孩子去到田芭，拿起犁耙来还没犁几下，太阳已经升到半天了。阿云娘继续犁着田，那条拖着犁耙的牛，给太阳蒸晒得舌头已经吐出尺把长，满背的泥土也给晒得裂成一条条的了。

丈夫在的时候，阿云娘是不做犁田的工作的，因为，这一套本事，她只看在眼里，却没有学到手上，现在犁起来的时候，仍然不会。她把犁头插得浅一些，牛拖着犁过去只是一层皮，犁了得再犁；犁头插得深一点，牛拖不去，得拔起来再插过。就这样，还只犁了不多的几行田。她人已经气喘吁吁得难以支持，手扶着犁耙，在翻得高低不平的泥块上一颠一跛的走过去，终于双脚不听使唤，有时跌了个四脚朝天，有时就摔倒在犁耙上，而一屁股坐倒在田里的事情更是多。犁着犁着，人实在疲乏得没有力气了，有时不跌倒也要叫牛停下

来，翻起一块泥块来坐了一会再犁。

阿云娘在这样地犁着，而在田边的树丛底下，是她搭了几张烂山葵盖成的一间小寨仔。寨仔里，围着她几个小孩子，有的还是吃奶的年纪。太阳晒得热了，肚子饿了，他们在哇哇地哭着。有时候，留在寨仔的成十岁的哥哥姐姐，蹲了一回蹲不住，就像麻雀一样的飞到了老远的地方，跳来跳去的自己玩，玩得起劲的时候，竹筒当鼓，烂桶当锣，就叮叮咚咚地敲打起来，不知道有个停。做母亲的本来不忍心去干涉他们，打断他们的快乐，可是小娃娃在哭，自己在犁田，只得大声地叫喊他们回去。有时候，叫喊得喉咙都破了，还是什么效果都没有，她只得自己去用奶头哄着孩子睡；有时候，气不过，抓到大的孩子就打，没打两下，却一阵心酸，自己和孩子们一起哭了起来。有时候，阿云娘犁得比较远，娃娃的笑声听不到，大的孩子也一、二个转头都没有声音，以为大家吃饱了在睡觉，但再过一个时候没有声音，做母亲的心里又害怕起来，慌忙放掉犁耙回去看。一看，大的孩子在地上睡得熟熟，小的孩子却哭得连声音都没有，只见小肚子在动着呢。

阿云娘不会犁田，孩子多，有很大的苦痛，可是她拿东西来见到我们同志的时候，却不出声。有一天，我们在寨边睡觉，从山顶上远远看见他那种犁田的样子，心里就难受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了。俗话说，人都是父母生的，心都是肉做成的，除了红毛鬼、唐尸和暗探走狗，看到这种悲惨的情景谁能不洒下同情的眼泪，特别是好心的阿昌哥，他再也忍不住，马上想办法叫了阿云嫂来，对她说：“你的田我们替你犁，只是白天有敌人巡逻，只得晚上来，你把手留着在那边吧。”阿云嫂看着大家，彼此都是相熟的人，虽然心里过不去，可是想到靠自己怎么也旱不垮回来，也就答应了。

阿昌哥和另外一、二个同志，是在牙拉顶的田里长大的，他们熟悉犁田这营本事，就是在黑夜里也能干得。于是，同志们晚上摸出田芭去，不会犁田的效响，会犁田的就犁田。

(上)

晚上

，怕火光，不能点火也不能抽烟，别的不成问题，可是夜间田芭里“兀仔”却实在不能“打限”（马来语 takan，顶住、忍受——编者），它们咬得你满头满面，用双手扫也怕来不及，可是手要扶着犁把呀。没法子，只好用“木屐”（杓兜）满头满面地包起来，单单只在眼睛的地方留出二个洞。

“兀仔”之外，还有蚊虫，天又黑，这样犁田自然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情，可是同志们还是每一晚从断黑犁到深夜，又从深夜犁到黎明。然后，在田芭拴好了牛，回到森林去睡觉休息。

同志们三更半夜替她犁田，阿云嫂的心里很不安，用牙拉顶人的规矩，做工最少要有点糖粥吃，可是这时候从集中营带东西出来非常困难，我们叫她不要；

可是，过了一天，不知她怎样弄法，总之糯米有了，糖有了，甚至还有鸡蛋，同志们告诉他：“不必这样冒险，我们现在不是没有得吃。”她却说：“这样我的心才安乐一点！”

夜里来犁田，“瓦仔”、蚊虫咬，人少睡，其时，也估计到粮食困难，同志们已日吃稀粥了。不久，大家瘦了些，眼睛深了些了。阿云嫂看到很难受。有些日子，她白天来做工，千求万求，从集中营带到一点饭来，每一次都要留着给我们吃，但同志们看到她白天做工肚子饿，放在面前也吃不下。这样，阿云嫂就像气她自己的儿子一样说：“一点饭，是忍住了气千求万求带出来的，你们却不要吃，以后带不到的时候要带也没法子了！你们以为我肚子饿，可是我饿一天回去还可“推”个饱，你们呢？”

(文种下页)

(文接上页)

禾种了下去之后，敌人对集中营的监视更加严密。群众带粮食出来更加困难了，我们有时连粥也没有好吃，只好吃椰子过日子。这种情形群众是知道的。初期，群众的猪是养在集中营外面的，阿云嫂、我的姐姐和一些别的妇女，还利用挑出猪食的机会，把东西用罐封密了沉在下面带出来；后来给敌人发现了，他们又打二重底的桶带，可是结果也被奸细出卖，阿云嫂一班妇女就常常被敌人叫去问话，暗牌走狗也常常威胁他们某月某日要抓了。

可是，不管敌人如何威吓，如何残暴，都不能吓退这些妇女，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已经深刻到“不共戴天”的程度，他们把脱离苦难的一切希望都放在同志们的身上，他们已经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管，心一横，真的像俗话所说那样，他们觉得“杀头好像风吹帽，坐监好比游花园”了。

就说阿云嫂吧，她带药品、带粮食，只要有机会，就带得多；同志们看到了真是替她担心，叫她不好带这么多，谁知道好像触动了她心头的什么伤心事一样，眼泪马上索索地滚下来，这样说：“同志呀！我并不是不知道危险，不知道死活！你们要知道，带多带少一样是抓。看到你们这样好，又这样凄凉，带少死，有机会我为什么不带多多？眼看今天的情形，我是迟早会被抓去的，总有一天要同你们分别，带多一点，你们有得吃用，我给敌人抓去也比较心凉！”

阿昌哥看到这种情形，甘愿自己没有得吃，没有得用，也不要叫她买东西。可是，不久，别地方来了一个交通同志，有病，不能不买一点药。见到阿云嫂，告诉她说：“你买得到就买，买不到也不要勉强。”当时，她只说：“买买看。”可是第二天她却拿了一大包药来，除了交代她买的药品以外，还有一些别的药品。我们同志又提醒危险，她却这样说：“看到同志们有病，顾不得别的了。”

有一次见到她，她一开头就对我们说：“你们要买什么就出

声吧，不买，恐怕我不能替你们买了。”说着，两行眼泪就掉落下来。我们安慰她，问她为什么。她说：“暗牌（便衣特警）要抓我，今天我给了钱他才没有抓；但是，你们知道，不要说我宁愿把钱丢在河里也不要给这些狗，要给，我也那来这么多钱呀！”

有一个时候，我们不愿叫她买东西，也不交钱给她，可是她自己一有钱，就把她所懂得我们需要的东西买来了。她说：“敌人已经口口声声说要抓我了，今天是我最后见到你们，还是明天是我最后见到你们，现在不一定了。今天，我还没有给抓去，还能带点东西给你们；说不定，明天，你们怎么饿都好，我也看不到，不能拿东西给你们吃了！”说着，说得她自己伤心起来，又在擦着眼泪了。

牙拉顶的妇女向来信神信鬼，头脑不免有点封建。她们以为自己用过的东西，是不干净的，不要拿给男子，甚至以为我们同志是干大事的，妇女的不干不净的东西会弄“衰”。曾经，我们没有衣服穿，阿云嫂又没法子带出来，所以只好将短裤之类的穿在身上穿出来。虽然是新新的只穿了一次，但她拿出来以后，还是用肥皂一洗再洗了才交给我们。现在，她看到我们没有得吃，群众又实在困难带东西出来。于是，她不能不使用在她认为是不干净的方法。她每天出来做工，就把一二咯米，用布绑在乳房上，甚至用布子像月经带

一样绑在下身。这些日子，我们一看到她到来，她第一句话总是“等一下”，接着走到小窠仔去，摸摸索索地脱衣脱裤弄了好一会，才又穿上衣服走出来，把那一二咯米交给我们。她不好意思提她怎样带，我们明明懂得也不去问她。吃着这样的米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激动的感情泛滥起来，觉得她像母亲一样地亲热，可又比对母亲还要尊敬她！

这是一个平凡的妇女，也是一个苦难的妇女；在深重的苦难里，越发显出她的伟大来。

（摘自金枝芒著《抗英战争小说选》，页159-164）

（下）



金枝芒的小说选读

〈烽火中的牙拉顶〉

第十章 妇女

【出土文学】系列之 金枝芒特辑③

16.08.2005

至情至真

访李瑞腾、杨锦郁，

谈商晚筠

报道◎张丽萍

商晚筠生前不曾自己亲自撰文透露个人文学道路发展状况，或畅谈其写作理念，甚至连出版小说集也不撰写自序或后记。杨锦郁女士的专访文章〈趋向成熟的坦道走——访大马作家商晚筠〉，自然是研究商晚筠文学的重要文献之一。



6月 的一个下午，我们拜访了台

湾文坛知名神仙眷侣——李瑞腾教授及杨锦郁女士。地点是他们的雅致书斋，设于台北市最新景点——101大楼观景台附近。抵达后，随和的李教授为我们泡了一壶香茶招待，热情的杨女士随后挟着3本著作而至。

马新一辈学术界对李瑞腾教授一点儿也不陌生。他早年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近20年来亦从事台湾文学、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是极少数把关怀面向也导向西马，甚至东马华文文学的台湾籍评论家之一（其他任教于台湾的研究学者如陈鹏翔、张锦忠等皆出身大马）。他现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与图书馆馆长，曾任教于文化大学、淡江大学；也曾担任《文讯》总编辑。在教学、创作之余，李教授有计划推动各种文学活动。他出版过《文学与尖端的对话》、《文学的出路》、《有风就要停》等二十余本以文学评论为主的专著。

杨锦郁女士是台湾《联合报》副刊召集人，从事人物报道、散文写作和翻译工作。已经出版的文集有报道文学集《严肃的游戏》、《用心演出人生》，散文集《深情》（与李瑞腾教授合著）、《温馨家庭快乐多》，翻译传记《约翰生》、《完美的陌生人》、《邓青》等，并以《温馨家庭快乐多》荣获中山文艺奖。杨女士的文字深情款款，面对人生聚散的欢喜沧桑，总有她深情又独特的体会，意味绵密又深刻动人。知名作家席慕蓉在她去年底出版的《远方有光》撰写的序文中就对她的文字驾驭功力称赞有加。

李、杨夫妇愿意与重味平生的我会面，是因为另一对著名本地文坛伉俪王润华教授与淡莹女士的牵引。我想，或许也是因为我目前学习的文学课题人物——高晓蓀，是李、杨夫妇的挚友。

杨女士表示，她其实与高晓筠仅有两国对面直接交流的机会。

杨女士曾经从事人物专访报道文学，而高晓筠留学台湾期间曾经先后荣获《幼狮文艺》、《联合报》小说创作比赛奖项，是台湾读者熟悉的海外作家，因此是杨女士当年专访的合适人选。杨女士于1988年到新加坡参加文学会议之际，经由彼此共同认识的文友永乐多斯博士的介绍，在半岛酒店与高晓筠初次会晤，进行采访，并书写了刊于《幼狮文艺》第420期的《越向成熟的坦途走——访大马作家高晓筠》（后来易名为《走出半峰小镇——访大马作家高晓筠》，收录于三民出版的《严肃的游戏》一书中）。在那次访谈中，高晓筠谈及自己的创作心路历程。高晓筠生前不曾自己亲自撰文透露个人文学道路发展状况，或畅谈其写作理念，甚至连出版小说集也不撰写自序或后记。杨女士的这篇专访文章自然是研究高晓筠文学的重要文献之一。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马新举办了多次国际文学会议，各国专家学者齐聚开会。第二次与高晓筠见面，亦是杨女士再次赴新参加文学会议之际。至于确切时间与参加的是哪个会议，杨女士已经印象模糊，因此向已经花费超过一个小时翻寻高晓筠研究资料的李教授求救：“瑞麟啊，你来帮忙一块儿回忆一下吧！”

“哎呀，想起来了，去年有个大马侨生向我借阅，大概还没归还给我。”李教授指的是高晓筠研究资料。他接着坐下与太太共同参与回忆。

他们的相聚地点是高晓筠于新民路租赁的组屋单位。

尽管之前只有一面之缘，杨与高却毫无隔阂地互话家常。原来，她们已经通过鱼雁往返培养与维系起深厚的友情。

“她理想在新加坡广播局担任编剧时，与香港同事在创作观念上出现矛盾，感到很不愉快，所以考虑提取新加坡公积金，回乡专职写作。”杨女士回忆道。“她也告诉我，为了改善身体健康条件，每天晚上十一、二点都到磨山公园跑步。我问她这么晚去跑步，不怕危险吗？她表示安全与否并不是她所会给予考虑的问题。可见，她是一位多么独立的女性！”

商与杨在第二次相会时没有交流写作理念。那么，在书信来往中是否加以阐述？

“就只一次。她感叹自己下笔与发表时间太快；而大文豪马奎斯书写《百年孤独》居然酝酿15年，连写12页的短篇小说也用上500张稿纸。”

李教授与商晓筠的沟通几乎都是透过杨女士间接进行的。商直接写信给李仅限一次，“谈论她计划到台湾参加女作家会议的事宜。后来忙着别的事而没及时回复。现在想起，还是感到很遗憾！”

李教授在为商的小说集《七色花水》写序时如此坦言道：“作为一个她只见过两次面的朋友，我能了解她多少呢？”

那么，他为什么愿意在百忙中不遗余力地促成“只见过两次面的朋友”第二本小说集在台湾的出版呢？

(上)



“她是太太的好朋友嘛，太太要我做的事，我怎敢不从？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后，李教授一脸严肃地道出“真相”：“我当兵的时候，大量阅读小说打发时间。当时阅读了高晓筠的第一本小说集《痲女阿莲》而深被感动。集子里书写的种族矛盾暗流是当时文学中难能可贵的题材，当时她那么年轻，所书写的生命经验已经那么丰富。我们这一代的好些人都对她很熟悉，对她有所期待。既然她很有才华，很优秀，就应该让更多人在1990年代初有机会继续阅读她的出色作品，我因此自然又不容辞地帮忙。当时远流出版社的“小说馆”系列主编陈南顺就跟我们年龄相若，对她也很熟悉与欣赏，所以答应为她出版。”

“高晓筠也曾经告诉我，她喜欢繁体字，希望她的作品以繁体字呈现。在台湾出版，可以实现她的这个愿望。”

高晓筠在国台期间频频得奖：1977年，她以〈木板屋的印度人〉荣获《幼狮文艺》举办的台湾全国短篇小说大奖优胜奖，成为最早在台湾获小说奖的马来西亚国台生，从此扬名台湾。同年，作品〈君从故乡来〉荣获台湾《联合报》第2届小说佳作奖；《痲女阿莲》荣获《联合报》第3届小说奖佳作奖。她是否可能有意识地期许通过获奖在台湾文学场域中为马华作家占位呢？

李教授阐述了他的看法：“我想她只是很单纯的，因为喜欢写作而参赛。在那个年代，“马华文学”的概念尚未真正成型，对于马华写作人而言，以侨民身分参与台湾文坛。直到20世纪80年代，傅承德等人成立大马新闻社，马华写作人才更加意识到民族的课题。”

高在书写的小说中彰显女性主体。她的书写是否受到台湾1970年代的妇女运动的启发呢？

李教授认为：“高晓筠并没有把小说男性人物无能化，或加以毁灭。她只是让大马与华玲的妇女故事，与女性文化人的现实困境，通过自己的小说再发生。”

杨女士补充说：“她的小说所经营的，是自己周边的事物。作为自觉性很强的女性，大学时期处理的是家乡所见所闻；进入商业社会以后，则自然会处理职场上较为不公平的人际与性别问题。在那个年代，她的自觉性所启发的女性意识，在马华文学中，是很有成就的。”

本着惜才的心态，杨女士不断在信中鼓励高晓筠继续创作。“她要求高，每个字都精细推敲。我在报馆工作，每天都与时间赛跑。因此觉得她的书写速度有点缓慢，写作量稍嫌少了点儿，需要推动。”杨女士在获知《时报》举办首届小说百万大奖时，立即鼓励高晓筠参赛。“我认为这个比赛的规格与她的书写才能与水平很匹配。”据了解，高晓筠原本打算经营以爱滋病为题材来阐明女性朋友间真挚情谊的《跳蚤》参赛。错过第一届比赛时间后继续努力，期待角逐第二届。她计划写48段，可惜只完成一半。

2.08.2005

结缡 22 载的李、杨二人感情情深，对朋友也同样交心。对他们而言，失友之痛可谓噬心刻骨。商晓筠骤然病逝后，李教授与杨女士分别书写了《筠之晚矣，绿转黄——遥寄大马小说家商晓筠》与《你会来道别吗？——哀商晓筠》、《石莲》悼念挚友。之后，也在学术会议中发表以商作品为研究主题的论文《商晓筠未结集作品的略述》与《论商晓筠小说中的女性》等。他们与商晓筠另一好友汤石黑更希望为商晓筠的遗稿结集出版，却因为以年轻读者为导向的台湾出版界不甚热衷，而无法如愿（他们的心愿终于在 2 年前由大马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落实）。

告诉他们 6 月 21 日是商晓筠 10 周年忌日，他们都同样惊叹道：“怎么这么快就 10 年了？”

尽管岁月模糊了一些细节，却冲不淡他们对挚友的至真思念。

那个下午，在他们的书斋里，我们就这样细细地品茗着……

不只是品茗着一口口热腾腾、清心润喉的香茗……

也品茗着一丝丝沁人心脾、动人心弦的怀念……

(下)



■作者（中）与李瑞钧教授（右）及杨德郁（左）合影。

逢星期二、六见报

浅析商晚筠的 自我追寻方式

文◎杨启平

商晚筠(1952-1995)，原名黄绿绿，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华玲镇，祖籍广东普宁，曾用笔名黄梅雨、商桑、舒小寒等。所涉文体包括散文、诗及小说，尤以小说的出色成就扬名海外，其创作上的成熟圆润，令读者及评论者瞩目。台湾李瑞腾教授就论定商晚筠对马华文学来说，其重要性不容怀疑，他也认为商晚筠的作品是马华文学的文化资产，不容忽视。^{注(1)}

商晚筠一向对自己的作品自视甚高，从《痴女阿莲》到《七色花水》乃至《跳蚤》这3本文集，商一再的实践了创新的操作，无论是文字、风格、情感上，商都努力的使用各种技巧，赋予其作品新的面貌。作家的目的昭然若揭：她的创作是准备指向未来，向“长远时间”的书写目标迈进。而所谓的“长远时间”这词其实取自巴赫金语：“长远时间”是巴赫金(M·M·Bakhtin)为了更好的观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确立其文学史地位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起源有自，但又超越了他的时代，指向未来。这里借用此概念主要是指出商晚筠有意为之的超越马华文学时空的隐含了现实性的书写，力求作品的纯粹性，也既是要求这些创作更多强调“一种精致手工艺的再生”^{注(2)}，应合了商在写作力求完美的态度。商晚筠往往为了避开所谓各种主义及理论或自我可能局限的主观原因，及本土色彩或物质性的客观原因纠缠，写作时往往一边写，一边还在修改前文。一再修改是她写作的习惯，《跳蚤》一文就是作家一再的修改习惯而迟迟不能定稿的例证。^{注(3)}结果人走了，作品却来不及完成，诚属可惜；当然这习惯也可看出商对其作品的重视。

说到这里，我们当然可以从中看出商对文字的执着及对创作的追寻。商认为文字是作品的灵魂，必须字斟句酌。注(4) 文字/语言对她来说是属于精神创造的活动，这正是语言哲学家洪特堡的论述，洪特堡还视语言为精神的产物与思维的手段，认为语言是人类精神力量不断更新，螺旋升华的创造。在他看来，语言的内在形式就是人们对事物的主观见解，是幻想和情感的产品。哲学家一直想洞悉精神力量与语言结构之间密不可分又复杂难辨的关系。注(5) 精神世界与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也是我在思考商晚筠在文字上刻意求工的努力，商在书写时可以为了写好一段就丢了十几张稿纸，有时不过是更动删减几个字。作家力求自己的作品有一定的深度，能够让读者读出弦外之音，文字与感受的传达更是密不可分。而通过解读商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商所力求的高度就是为了“长远时间”的经营。商晚筠匠心独运的实践和追求，力图通过自己的书写寻求中文世界阅读和鉴赏的共同喜悦，甚至有再造经典的野心。永乐多斯博士赞过商辛苦的创作，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留下可以传之后世的作品。注(6) 正如有论者认为《痴女阿莲》出版之后颇受好评，证明了作家的苦心经营。商刻意写出了台湾读者眼界之外的存在现实，这本小说集不但让她声名大噪，也充实了“马华文艺独特性”空洞的内在。注(7)

关照中有积极人世情怀

可是，单单把商晚筠的解读置于马华文学的视角观照下自有其局限性，我们往往片面化了商的独特性及其不可限量的文学建材。外文系出身的她，肯定熟读西方经典，有论者就说过一些欧美作家如D·H·劳伦斯、乔伊斯、吴尔芙乃至南美的马查斯等的作品，都对她有相当的影响。注(8) 显而易见商晚筠文字的锤炼，叙事独特，旁观者的冷静，早已把她自己放置在优秀作家的行列上。商的第一本小说集《痴女阿莲》已从客的以旁观者/女性视角来提供必要的陌生化效果，从而让许多熟悉的事物具体再现于语言的陌生，重获存在的价值。也惟有这样，商的书写获得特殊时空坐标下的历史性支性。而潜藏



在她小说创作背后的意蕴，明显的给我们一种接近南洋华族沧桑历史的临场感，感受到心灵上的冲击。再加上文本里显现的文化触觉，女性关怀，

自我追寻，从关照中积极入世的情怀和应世策略，都显现了商向“长远时间”的洞察。

从《痴女阿莲》文本一系列本土/家乡意象的再现，到《七色花水》文本阶段的女性主义书写，商晓筠最后发表的两篇完整的小小说遗作，〈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及〈泥土〉，似乎又回到了本土。她的两篇遗作包含了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信息，并揭示历史的情景及主体价值。在小说〈泥土〉中，作者巧妙的把自我实践与自我属性的完成比拟于塑土为陶的过程。作家把自己想像为一团泥土，要是没有创意的催生，就等于只是一堆一无是处的原料罢了。文本从揉土拉坯的事件中，作家体验了生命/思想/情感及创造想象的穿透力。生命有限，惟有将之客体化方能使主体意识不朽。注例：〈泥土〉中的商晓筠用个体的困阻，隔阂及孤独来寻觅个人出路时，似乎从中看到自己实际的身分和自己的最初。文本中的所蕴涵的颠覆与重构的意识形态更得以彰显。因而〈泥土〉可看作是商晓筠艺术信仰的自我表白之作。苦心孤诣和精致的身体力行，让商找到了一个起点，寻找“长远时间”书写的可能，因为所有作品只有在此比概念的关系和评判下，才有可能实现商所谓的传世作品的生成。

〈南隆·老树·一辈子的事〉是商晓筠去世后发表的作品，这篇小说极富象征意义，除



了隐藏的政治意味，作家重新思辨了一些更为本质的东西，比如土地、家族及死亡。商其实并没有忧国忧民的意识，也不眷恋过去与故土，作家只是对切身体验的不确定和探求寻找庇护和认可，所以文本中商准备以死亡来告别《痴女阿莲》文本内稍嫌内窥的本土视角，迈向更远的，向外探视的野心。于是后现代著名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敏锐地指出“本土”可被视为希望和困境共存的据点（A Site Both Of Promise And Redicament）注(10) 的这句话在这里就显得有意义了，当商走出《痴女阿莲》后的困境，这篇遗作更富象征意义，那就是恰好象征了商作为一个脆弱的生命个体，本身并无法预期的一个终点，或者也是商重新出发的起点，一个可能的未来，一个希望，虽然现在一切已是不可预期了。

在为了“长远时间”书写的模式和意念中，商晚商其实是在大众息息相关的人生体验交集中，挑战自我，勇于试验，即富独特叛逆性，又可能开拓，提升了读者的阅读期待。除了未完稿的《跳蚤》，描述了有关女同性恋者情感挣扎的文字，让读者思考其中悲观迷惘的情愫外，商另有一篇也是才写了2万8千字的小说遗稿《人间·烟火》，行云流水的文笔，描述女叙事人与其继母互相搏斗的故事；商把两位女性从相互歧视至相交的过程写得真情流露，个中摸索的轨迹虽然有些不确定，但文字呈现的画面清晰，时空跳跃急速，显而易见商有返璞归真的迹象，她的苦心在于剥开人心内外的来源、偏见和层层迷惑面具。通过回归早期本土书写的话语，来抗衡无孔不入的空虚感，虽然作品未完稿，但小说本就是一个未完成性和开放性的体裁，其创造性书写也是无穷无尽的，就如巴赫金所言：这是在早已形成和部分地已经死亡的诸多体裁中间唯一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体裁。这是世界历史新时代所诞生和哺育的唯一一种体裁。因此它与此个新时代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注(11) 同样，商未完成的作品也具有这种魅力，让读者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去体会并解读。商曾在访问中说过写作是她生命的最爱，而且在写作上，她也力求完美。前面说过，她曾说要突破性别的障碍来写作，注(12) 就是希望自己能以客观的视角把自己所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在具体情境下，这也是在商实践她的“长远时间”书写，完成她独特的超越野心。但商晚商毕竟只有终点，没有起点了。惟文学中的“长远时间”的书写实践却让她有了永远的可能。

参考文献：

- (1) 李瑞麟《商晚筠未结集作品略述》，1997/11/28 至 12/01 在“马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收入《论文与报告》页 55-67
- (2) 王德成《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 20 家》序：《李锐的遗囑——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 20 家》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 (3) (4) (6) (8) 永尔多斯《跳蚤》序：《定水无痕——慷慨的作品》，马来西亚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页 1-9
- (5) 威廉冯洪特堡《人类语言结构的层升及其对人文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
- (7) (9) 黄锦树《本土与自我身份——小论商晚筠》（南洋商报·南洋文艺），1995/10/13
- (10) Asif Durr. The Global in the Local, see Rob Wilson and Wimal Dissanayake (eds.), Global/Local/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 P.23.
- (11) 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小说理论》，河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页 506
- (12) 杨群舒《严肃的游戏》，台北三民出版社，1994

商晚筠作品：

- (1) 《海女阿莲》，台北联经出版社，1977
- (2) 《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
- (3) 《跳蚤》，马来西亚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

2005 年 10 月 18 日 ●



剧终人散 雁去留影

犹如镜子反映现实

——征雁的戏剧



本报特约：李锦宗

1937-2006



本地马华作家征雁日前逝世，征雁是50、60年代马华重要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的戏剧创作。《南洋文艺》特策划有关征雁的特辑，以文字书写来悼念征雁……

征雁在小说和散文的创作方面有过特出的表现，然而他是以戏剧作品在马新文坛上奠定重要和崇高的地位。因为他写了数量多、质量好、适合搬上舞台的独幕剧，在戏剧创作一向贫乏的剧坛上显得鹤立鸡群，这使他在马新戏剧运动史上占了灿烂的一页。这是他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马新戏剧界作出辉煌贡献的成果。

他自幼喜爱文学，念初中时已对戏剧拥有浓厚的兴趣。他前往檳城钟灵中学升学后，在校内发起创立戏剧研究会，表现出他对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热衷。

他不但编写脍炙人口的戏剧，同时成为一些剧作的导演，甚至粉墨登场。他最后一次在台上饰演《钟馗夜访》的主角。他可以说是一位全能的戏剧工作者。

他的独幕剧都是在檳城、巴生和新加坡写的，其中在巴生写得最多，因为他在家乡居住的日子比较长，直到他与世长辞为止。

收在他单行本中的剧作，最早的一篇是于 1956 年写于檳城的独幕剧《父与子》，而他最后一篇戏剧作品是于 2004 年为第 8 届马华文学节开幕文娱晚会而写的戏剧小品《在那遥远的地方》。屈指一算，他跟戏剧创作结缘大约 50 年，占了他一生的四分之三的时间，始终不会不弄这一方面的兴趣，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生前一直在发挥这项才能，为文坛和华社推动这种甚少人参与的文艺活动。

征雁在戏剧创作上的特色是专写独幕剧，可谓独沽一味，几乎没有看过他写多幕剧，这可能是他擅长以这一种体裁来呈现他心目中的观点。

他主要的剧作都收集在他已出版的 3 部戏剧集内：

《封锁线》，1961 年 12 月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选收他 5 篇独幕剧：《父与子》、《新的课程》、《剧后》、《封锁线》、《楼上人家》。

《夜渡》，1962 年 1 月由新加坡文工书店出版，选收他另外 3 篇独幕剧：《雨夜》、《潮来的时候》、《夜渡》。

《征雁剧作集》，1965 年 7 月由新加坡新马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这部戏剧集其实是《封锁线》和《夜渡》的合集，另外增加一篇独幕剧《青年作

家》，总共选收 9 篇作品。

他的别集《在高天外看春秋》选收了他一篇戏剧小品《在那遥远的地方》。

他的剧作曾被选入新马出版的大系：

《雨夜》、《潮来的时候》、《夜渡》被选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70 年代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

《钟馗夜访》被选入《马华文学大系——戏剧》（2004 年由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联合出版）。

在这些戏剧作品中，《雨夜》被搬上舞台的次数最多，由此可见，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可视为他的代表作。从 1957 年起，到 1966 年，新加坡后港乡村住民联合会、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康乐音乐研究会、理电发工友联合会、表演艺术学院等社团组织先后排演这幕独幕剧，总共多达十余次。

《雨夜》描写一则发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的悲剧。父亲王山叔患病不能工作，母亲替人洗衣，女儿秀兰半工半读。长子大海因当工人代表被雇主开除，非法经营胶丝买卖。次子大智正在念书，课余蹬三轮车，以帮补家用。大家正愁秀兰没钱缴交学费时，忘恩负义的屋主又来催租，大海被橡胶商告发而被捕，大智则被流氓打伤，重重的打击逼使王山叔在雨夜疯狂地冲出家门，要找他们算账去。

除了《雨夜》以外，《潮来的时候》、《别后》和《楼上人家》等剧经常由学生团体和社团排演，反应令人鼓舞。

评像《雨夜》等剧一样，征雁的剧作大致上犹如镜子一般，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情况。剧中所刻画的大多是平凡和普遍的人生百态，由于处理得合理，在毫不过度夸张的情况下，以简洁明快的手法安排剧情，故事的发展扣人心弦，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共鸣，达到戏剧应有的效果。

他的编剧技巧继承传统，可说是跟马华剧运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并不保守。他不迷信各家各派的戏剧理论，而顺应着时代，利用他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剧中的表达手法，以传达他作品中的信息，因此看不出他要以标新立异的姿态来虚张声势，以达到戏剧性的目的。

有关征雁生平和著作



●征雁是陈达人惯用的笔名，而陈征雁则是他从从事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的名字。

●1937 年生于巴生。1956 年，念高二时，由于反对学校改制，参加学生抗议行动的学潮，被当局开除学籍。隔年南下新加坡，到育英中学高中里升学。离校先修班毕业之后，受聘于诗人柳北岸主持的邵氏机构中文部，负责电影剧本和宣传工作。1963 年，参加科伦坡计划在日本放送协会主办的电视编导训练班，返回新加坡以后，出任文化部（电视与广播）主编。

●征雁自幼热爱文学，读初中时已手不释卷，阅读了不少的文学著作，同时提起笔杆学习写作。1954 年，他前往模越仲灵中学高中预备班升学时，他的文艺作品开始在该校出版的学生刊物《学报》、南洋商报的《文风》（杏影编）等报刊发表。

●他最初从事小说的创作，过后编写不少脍炙人口的剧本。他也写散文和评论，以磨练与推广自己的创作能力和路数。他在晚年应邀写专栏，表现出他在杂文方面的底子不浅的功力。由此可见，他对各种文学体裁的掌握，应付自如。

●他于 1969 年从新加坡返回巴生定居之后，就靠文学创作谋生。在这三十多年内，除了 1987 年编写独幕剧《钟馗夜访》之外，似乎没有拿出其他杰作示人。他大约在 2004 年重新拿起笔杆，在两年之内，发表了十多万字，最后结集成成书《在高空外看春秋》，这也是他最后一部著作。

●1969 年，他回到巴生定居。1973 年开始投入政坛，1983 年，他从政坛引退，转入社团为华社服务，直到他离开这个尘世为止。



▲是征雁最后一部著作。
《在高空外看春秋》



▲书影。
再版的《升旗山下》

21.01.2006

我推荐《升旗山下》

本报特约：陈雪风

陈征雁是马华文坛土生土长的作家。他活跃于 50、60 年代的马华文坛。他是战后涌现的第一代本土作家，在当时，他是闻名遐迩的马华青年作家，也是文坛上少数从事创作剧本的作家，名气很响。那年代他所创作的剧本，受到中学生的普遍欢迎；多数都曾经在新加坡与国内的中学校排演。

他也写散文与小说，他的作品在 50、60 年代广受受到读者的喜爱。出版的专集，一版再版，相当畅销。

如果我说，陈征雁写作的散文、小说与话剧，在报章上发表，激发了中学生的阅读与爱好写作的风气，或者说他是当时中学生的文学偶像，相信没有人，特别是上了年纪者，是会持有异议的。

《升旗山下》是一部小说，书写的是 50、60 年代中学生的生活与爱情故事。三角恋爱的故事，但由于发生恋爱的背景是历史上首次学生运动，所以，就加添了很重的社会意义。

征雁的老朋友，也是当年学潮的学生领袖之一的欣泽说：“这个爱情故事写得旖旎动人，美得要命。”

的确，《升旗山下》所写的爱情故事，我也深受感动。

原因是升旗山下的爱情故事，虽然有三角关系，但它却不落入俗套。随后出现的第三者不是横刀夺爱的那种。而且第一者由始至终都没有正面出场，他与第三者度山没有冲突，而度山更一直抱着歉意在自责。美丽的女孩是惹人爱的，一个之外，多了一个人，那是正常的事。云情与度山发展的超友谊的情感，虽是几经波折，然发展是非常温馨，一点也不会招人非议。

当一对青年男女堕入爱河，情迷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了传统美德的情操，有深情与激情，却是十分的清醒与自制。

抑制了的一份情爱。他们意识到的是彼此都不愿也不允许把彼此的真情与爱恋纯洁的美境破坏，让她沾上一些污点——有爱有泪，有情有恨的恋情，就如那酝酿半潮过程充满着美丽的理想、激昂的追求那样，绝不能被背叛；必须以生命的忠诚去维护。他们却自觉地对于彼此互相接受示爱，而内心有很深的内疚，认为自己所涌现的是不很高尚的情感，他们要对道义承担责任。

所以，当他们的爱情发展至关键的关头，他们终于能平静地分手告别。

简单说，《升旗山下》的三角恋爱的故事没有自私的意志与因素，作者把三角的恋爱书写成一对情侣的爱恋；同时，还将时代大义与爱情放在一起思考与衡量，为让大义涵盖着儿女情爱，使之更感动人而富有耐人寻味的意义。

征雁将这样的一则爱情故事与一段特定时期的历史交杂着来书写。他们的抱负与构思皆是十分可取。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加重了小说的社会思想性，让小说跳出了俗套的爱情框框。

第二点，我觉得《升旗山下》书写的内容，值得赞赏与珍惜的是，它在描写一对青年男女——度山与云情，显然，作者是要把他们描绘成当年值得尊敬与爱戴的青年形象。特别是书中对度山的思想与心理状态的剖白，在在都予人一种美好青年形象的表征。

我不清楚征雁是否有意要通过他的故事，塑造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的美好形象。但我却觉得度山与云情成了那年代的美好的青年形象。

阅读《升旗山下》的读者，都深为她的爱情故事而感动。

这除了她的爱情故事“美得要命”之外，还应该归功于征雁的文学造诣高，行文优美富有文彩。

征雁是一位写作散文的高手，因此，他为《升旗山下》带来第四个特点。那就是在开展故事情节的场景描写，如果串连起来，就是一篇对楠城风光洋溢着精致的颂歌。



基于《升旗山下》拥有上述多项特色，使它成为多年不可多得的一部文艺创作，现在再版，我们读来，依旧爱不释手。说明了它是无愧于反映时代现实动态；青年一代关切社会问题与他们在讲求自我与自私的情爱与快乐的思想情感。就书中的男女主角对爱的观念与生活的追求，与写下唯我与反叛传统、沉湎于新潮时尚享受与执着来参照，我更加深信地这篇小说具有启迪的意义。

艺术的欣赏与阅读文学作品，绝对不是单纯的消遣，因为作家的精心构思，完美设计与呈献的故事，不无在渲染与发扬什么，以数为未来完美的人生建构一种构图与理想。

当然，你尽可以追求别的，甚至反对我这样的阐释。

不过，在作出你自己的选择的，是不能没有一定的实际经验与认识的。

因此，我向你们推荐阅读《升旗山下》。

P.S：这篇文章原是准备在《升旗山下》新书推介礼上的致词。可惜，在策划中的推介礼还没有落实，推展兄却就走了；如雁飞过天空，飞向远方。一篇开场白式的文稿，如今竟要当作追思的纪念，并再道一声：红雁兄，安息吧！



▲红雁（右一）于去年8月间在巴生款待前来新马收集戏剧资料的中国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康海宁（中）。陈雪风（右二）、柯福（左一）和李锦宗（左二）都是座上嘉宾。

1937-2006



敬悼陈征雁先生

● 本报特约：马汉

1月7日(星期六)的大清早,我一打开当天的《南洋商报》,就看到一则令我震惊的新闻——新闻中说:马华文坛著名的剧作家兼小说家陈征雁先生因病逝世了,新闻的一边,刊登了征雁兄的遗照。

当时,我的脑子里立刻充满了疑问:“怎么会呢?在这之前,也不曾听到他患病的讯息呀!”由于我赶到补习中心去上作文课,新闻也不及详读,更不必说去向朋友求证了。不过脑海里一直在盘旋着“人生多变更”、“人生有许多无奈”这一类的感叹,自然也夹杂着在悲叹着年纪大了,免不了要过这个“大关”……

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我总是特别忙碌,因为我得上好几节作文课,每2个钟头一班,从早晨9时正,直落到下午6时为止。

不过,当脑子里一有空隙的当儿,就会思念起与征雁兄交往的一段文字因缘来,也想起不久之前,陈雪风兄才告诉我:征雁在《升旗山下》修订版出版之后便告诉他要举行一个推介礼。他也替《升旗山下》写了一篇书评,征雁已把这文附印在书后,还邀他在推介礼上为他担任“解读”。雪风是在去年11月7日至11日这几天里,当我和他结伴到广州去游览期间告诉我的,我记得当时还对雪风说:“届时只要不是拜六及礼拜,我必定会出席的。”这件事记忆犹新,可是,这个“推介礼”可能永远不举办了,因为征雁已经逝世了……

征雁兄比我年长2岁,可是,他却出名得很早。大约在50年代中期,征雁的短篇小说及剧作便不断出现在报刊之上,其中多数刊登在杏影先生主编的《文风》副刊。(后来我才从征雁口中获知:他是当年被杏影先生看重并加以提携的青年作者之一。)

当年——1954至1956年,我才只是个初中生,刚在文艺园圃上起步,课余时间不但读30年代中国作家鲁迅、巴金和冰心、老舍的名著,也读本地的文艺期刊和副刊。《文风》是我每一期都读的文艺副刊,还有《新报》的《新园》(黄科梅主编),至于文艺期刊如:《沙漠风》、《耕耘》、《荒地》、《人间》等刊,都是每期必读的。而征雁的作品,大约都可以在这些刊物上读到,因此对他十分钦佩。

从1961年开始，在短短的4、5年间，征雁的文艺创作集便一本接一本地面世了。依次应该是《穷途》（小说集，1961）、《夜渡》（剧作集1961）、《封锁线》（剧作，1962）、《后方的诗篇》（散文集，1964）、《征雁剧作集》（剧作集，1965）与《升旗山下》（中篇小说，1968），这个记录在当时是青年作者之中，是属于“高纪录”的，而且他的著作出版之后，都大大地受到读者的喜爱，一版再版，其中《穷途》曾创下一连5度再版的记录。在这段时期，我虽然也有4、5本著作面世了，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却一直钦佩征雁的才华及成就，一直把他当作自己学习的对象。

说来，征雁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不但在创作上是个“多面手”——既写小说，又写剧本，还写得一手优美的散文；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能写，而且也能亲自粉墨登场，上台演出。

1964年到1967年3年间，他受聘于新加坡文化部，担任该部出版的《电视与广播》周刊主编。他在极短的时间便把《电视与广播》周刊编成一份畅销的周刊，刊物中不但刊登电视与广播的节目情节、艺人动态、影坛情报之外，也刊登小说，以及文艺作品，渐次编撰的《新马华文文艺丛书内容提要》的系列，便在当时的周刊里连载。

征雁在这段时期，也曾经受邀参加当时“艺联剧团”而先后在舞台上演出《金小玉》（扮演剧中的王司令）、《清宫怨》（姚克的名剧作，即以光绪皇帝与珍妃的哀怨传说为内容的清宫悲剧）中的光绪皇帝及《父母心》中的父亲。

当时，新加坡电视台开始播放本地的剧作，征雁兄也参与“开拓”的工作，把《父母心》从舞台上搬上了荧光幕去。

征雁于1969年举家返国，定居在家乡——巴生。这以后的36年间，正如新闻中所说的：他一生可以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事文化工作；自1973年开始涉足政坛，扮演政坛上要角；1983年以后，他转向文化、社会工作，担任社团要职，推动社会、社区、乡团等的文化、习俗等等的活动。他在一生中，真正地作出了奉献！

1月7日晚上，我与雪风兄通电话，当时他刚到夜府去吊唁归来，他也为征雁兄的去世感叹良多，他说：“他是个能做事的热心人士，他正想在文化与文艺上再作奉献之时，却突然去世了，真是遗憾的事呀！”雪风兄的感慨，正是我心中要说的话！



20.05.2006

◎李锦宗 文学观察

《雪泥鸿爪》 文坛点滴 中的

马华

文坛前辈马华先生最近出版了自传式散文集《雪泥鸿爪》（红蜻蜓出版），选收他过去所写的有关生活、工作和文坛往事的作品。他描述的手法 and 文字的驾驭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令人读了感到趣味盎然，而且不少篇章的行文和叙事，好像他的一些小说一般，具有高度的幽默感。

在这部集子中，有关童年、少年和当兵的生涯的作品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而他驰骋于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的记录，所占的分量竟出乎意料之外的少，因为他在上述三地的文坛活动了五十多年，理应有写不完的见闻和感想。他自己也在《青年才俊，济济一堂》一章中指出：“假如把当年《学报》的编辑和同事一一写出来，简直可以写成一本专著。”（第535页）何况还有《蕉风》内外的事迹以及其他各种文学的活动呢！

1953年，他进入《中国学生周报》当校对，几个月之后升任总编辑，同时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学的创作，从此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这是他迈入人生另外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后来他在马来西亚主编《学生周报》和《蕉风》，在推动现代文学方面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勤于文艺创作，出版了多部各种体裁的著作，在马华文坛上为人所熟知。这些经历都值得他大书特书，为后代留下一些文学的烙印。但他没有这么做，委实可惜。

姚拓在第4章《香港岁月》中的《文学道路，既漫长且长》一节中透露：“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在穷途末路时到香港以后才开始的。”（第521页）他在《后半生的转折点》一节中又说：“我后半生的转折点，是从认识白兄开始的。”（第527页）因为《儿童乐园》编辑白起白介绍他进入《中国学生周报》任职。这个领域的工作使他“爱好文学的本性也就慢慢地显露出来”（第521页）。他表示：“我的后半生的生活，能够与文字或文学日日为伍，当然与我以后的编辑工作有莫大关键。一个人假如真的有幸生的话，下一辈子我仍然选择去做编辑。”（第521页）由此可见，编辑的工作的确是他人人生乐趣的焦点，不但能够借此为生，也能在文化和文学上为社会作出贡献。他已经达到这个生活的目标，这一生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了。

他是在1950年6月由南京移居香港，1957年2月离开。在将近7年之内，他也出任《大学生活》社长及总编辑等职，出版小说集《二表哥》，参加香港中国笔会等等文学活动。后来定居马来西亚，他仍然在这个英国殖民地出版小说集《弯弯的岸壁》和《五里田之花》以及散文集《美丽的童年》。他在香港文坛显露了一些表现，因此，在1997年，刘以鬯主编《香港短篇小说选——五十年代》（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时，就收入了他的《弯弯的岸壁》；在1999年4月，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6章第2节《第三波南洋作家的小说创作》中也提到姚拓，在大约200字的简介中，执笔者针对他的作品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价：“……姚拓的小说内涵深邃，技巧圆熟，构思超性、艺术性与可读性于一炉。”（第228页）

在《雪泥鸿爪》中，他写到有关香港文坛的，计有《文学道路，既漫长且长》、《后半生的转折点》、《青年才俊，济济一堂》、《香港文坛三剑客》和《良朋益友，同碰共碰》共5节文字。在他提到的作家中，以黄思骋、力匡和齐桓介绍得最详细，因为他特辟一节《香港文坛三剑客》来写；其次是白齿、司马长风、赵聪、方天、燕归来、薛洛、中青、彭子敦、黄黛和徐东滨等人。点到姓名的计有徐速、愚果、岳寿、王敬轸、古梅和杨远等人。在这些作家中，司马长风

曾经前来吉隆坡为马华公会服务，杨远刚到霹雳州实兆远一所中学教书，而黄思腾、白晝、張归來、薛洛、彭子敏、黄崖、徐东滨和古梅等人先后在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友联出版社从事出版和编辑的工作。在他们当中，在执行任务或工余之暇，有的勤于创作，有的积极参加文艺活动，多多少少发挥了一些影响力，然而，姚拓并没有把这些情形和运动详一层写出来，让年轻的一代知道这一段平为人所知的事件。

姚拓是在 1957 年 2 月从香港抵达新加坡，逗留到翌年 8 月。在这一年多期间，他主编《学生周报》，兼任《蕉风》编辑。他在这个小岛的创作生涯不长，参加的文学活动也不多，因此，他没有特别辟出一个或一些章节来详谈他初到新加坡的编辑工作和他所面对的人和事，这使他对一生的叙述有一小小的缺欠，也使这部集子的结构不甚十全十美和完整，由于新加坡毕竟是他人生的一个小驿站。

他在 1958 年 8 月随上述两份刊物的编辑部的迁移而前来吉隆坡，从此就定居下来，直到现在，住了将近 50 年，难怪第 5 章的题目定名为《马来西亚变成了我的故乡》。虽然他在马来半岛居住了几十年，比在任何地方还长久，但他对当地文坛的描述，只有：《学生周报的发起与没落》、《马华文

学上的长青树——蕉风》和《剧艺研究会的发烧友》，在本书内容的比例上，实在有不足够之处。其实，他所知道的《蕉风》和《学生周报》比任何人还要多多；他在马来西亚所写的作品和所出版的著作比在任何地方还多；他在本地所参加的文学集会不计其数；他所交往的作家多如恒河沙数，因此，如果他愿意，单在这一方面就地取材，进一步加以发挥，便能够写成一部厚厚的专著。他在《自序》中说：“事实上，我一生中绝大部分的时光，都花在马来而亚，一直到今天的 1998 年，我的最主要的工作也是在马来而亚。在我的自传里，这么长久的一段岁月，应该有第五部分，但我在 1997 和 1998 年写完自传中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部分之后，我觉得第五部分的文字最难下笔；因为牵涉到的时间太长，接触的朋友太多，我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取舍。假如把我所做的事和我所认识的朋友都一一写下来，可能完成了我的流水日记，反而令读者不忍卒读。如此说来，缺还不如藏拙，决定暂时不写，或者以后都不写。”幸亏他后来改变初衷，继续写出第五章，否则这便会构成《雪泥鸿爪》极大的美中不足之处。无论如何，有关姚拓和马华文坛的部分依然有所欠缺，希望他以摘要的方式，继续写出这一方面的文

字，拼入再版的《雪泥鸿爪》，或者另行出版单行本，以便为下一代留下一些马华文学的史料，作为他们研究和参考之用，抑或作为一般人的读物，以增加他们在马华文学方面的知识。

诚如《雪泥鸿爪》的副题（姚斯说自己）所表明，这是一部他以散文的笔调描写他自己过去各种生活经历的自传式集子，然而有些地方他说得很多，有些地方则说得很少，甚至轻描淡写，尤其是在文坛方面。



■姚斯自传式散文集《雪泥鸿爪》

南洋文艺

值得他大书特书，为后代留下一些文学的烙印。但他没有这么做，委实可惜。同时勤于文艺创作，出版了多部各种体裁的著作。在马华文坛上为人所熟知。这些经历都凝缩在马来西巫主编《学生周报》和《蕉风》，在推动现代文学方面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

怀念

彭士驊
校长

散文 ○ 永乐多斯

2001年彭校长应《南洋商报》之邀撰写专栏。在每周一千字的方块内，她尝试着写她的“回忆录”。《晚晴幽草》收录的就是当时专栏连载的近百篇文章。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分开来读，篇篇都是隽永的小品。



2004 年 5 月我到

怡保喝喜酒，回吉隆坡前，我去高尔夫球场路彭士麟校长的家看望她。彭校长是我的忘年之交，去怡保不论是公为私，我一定会去看看她和她喝茶聊天。虽然每次见面时间不长，但是我们都很开心，尤其彭校长对我的关怀、提醒，更让我享受到母爱般的温暖。

只是这一次，情况有些不同。过去她总是神清气爽，笑容满面的和我打招呼，然后就为我准备吃的、喝的；可是这次，她由女佣搀扶着从楼上走下来，举步维艰不说，连声音都气若游丝。虽然她还是勉强堆起笑脸，我却可以感觉到她的辛苦。从前我们天南地北闲聊，由个人的琐事，谈到家事，文坛事，甚至国事，天下事，可这会儿她才说了没有胃口，精神不好，就讲起百年之后要如何如何。我听了心里十分难过，告诉她胃口不开不是什么大事，老人家常有这问题，只要医生对症下药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她听了微微点头，交代我自己也要注意身体就结束了谈话。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一个多月后，她离开了人世。

彭校长的离去，带给我的
是伤痛和怀念，也让很多马来
西亚人感到惋惜。她不但是我
国的教育家也是著名的作家。
今天不少在各行各业拥有一片
天空的女性，出自她的门墙，

称她是好老师、好校长；而她的读者群也包含了社会各阶层，他们都欣赏彭校长清纯的散文小品。彭校长待人亲切，温和的态度让人如沐春风；彭校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气让人敬仰。如果生在古代，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在今天，她掌校二十余年的才干与魄力，也是现代新女性的典范。她的逝世让亲近她的人伤痛，也是文坛的损失。

2001 年彭校长应《南洋商报》之邀撰写专栏。在每周一千字的方块内，她尝试着写她的“回忆录”。她从少年时代开始写起，娓娓介绍她的家乡、家庭状况，她的中学、大学生活，对日抗战的艰苦流亡岁月，国共战争逃亡到香港的日子，结识她的另一半，远嫁来马，执教鞭，掌校政，一直写到她从霹靂女中退休为止。这本《晚晴幽草》收录的就是当时专栏连载的近百篇文章。如果我们把这些文章分开来读，篇篇都是隽永的小品；而如果一口气把它当作彭校长简单的回忆录来读的话，不但会对她有更深的了解，也会对当时的中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有更深的认识。



我认识彭校长时，她刚退休不久，正是在她这本书的“结尾”部分。但是我觉得她退而不休，活得很精彩。因为不用为校务操心，她尽情地在喜欢的读书写作绘画书法上面下功夫。只要我一阵子没见到她，她就有新作品出炉。除了到处云游，她也热心参加本地的文学活动，不但正襟危坐做笔记，还替大伙儿拍照。对于文友她很爱护，从不倚老卖老，说话充满了关切和鼓励。她文如其人，清新淡雅，让人乐于亲近。

彭校长和我们家三代都有“交情”。我的母亲比她年轻几岁，但她们是同时代的人，都爱好文学，也一起经过中国苦难的时代。她们见面次数不多，却有聊不完的话题。母亲很敬佩彭校长，她说彭校长看起来温柔，但做事坚持原则，面对挑战也锲而不舍。看完这本“回忆录”中彭校长的种种事迹，我觉得母亲说得一点也不错。

彭校长和我母亲谈得来，和我女儿也是好朋友。其实只要讲到我能拥有这个宝贝，彭校长都说这是她的功劳。在有了两个儿子之后，她老人家劝我一定得生个女儿，她说这样才算“好”。结果女儿生了下来，她比我还高兴。大老远从怡保赶来医院看我，说也奇怪，刚生下来的女儿，竟然会对她咧开嘴笑。

大概是这缘分，女儿爱她得紧。小时候对她“投怀送抱”，大了跟她老人家也有说不完的话。她们俩都是“爱动物一族”，不但会交换养宠物的心得，还会交换动物未养。当然在这方面，彭校长“贡献”比较多，能养的宠物都送过我的女儿，不但如此，还教她各种照顾动物的秘方。女儿曾有当“兽医”的宏愿，彭校长绝对是“推手”。

彭校长对我一向也是疼爱有加，到怡保，她常邀我住在她家，然后带我去到处去吃好吃的东西。有时不出门，我们俩闲坐她家宽敞的大厅，从早谈到晚，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爱听她用浓浓的湖南腔跟我说她的前尘旧事，我也尊重她给我的各种做人处事方面的指导。我们相隔两地，见面不多，但是我知道她对我的关心、爱护，我也以在她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地盘”感到开心与满足。

彭校长以八十高龄辞世，在华人来说，她享了高寿；同时她与梁博士伉俪情深，子女满堂，各有成就，也享受了美满的家庭生活。而她从事教育多年，为国家、社会培育人才；在书法、文学方面，不懈努力，丰富了我国的艺坛，也发挥了自己。因此尽管不舍她的离去，我们也要为她活出圆满的一生喝彩。



彭校长的葬礼我在外地没法参加，但她的美貌身影永留我的心底。我感谢她接受我当她的“小朋友”，我也要向她为模范，宽容谦和、不断进取、勇敢温柔兼备，做一个自己快乐也给他人带来快乐的女性。

2005年8月16日 ●





■彭士驊校长书画了
得，琴艺也不赖。

文学视听室

彭士驊书画创作、
名家书画、师生作品展
暨著作《境境幽思》推介礼

日期：8月14日
时间：2.30 pm
地点：隆刺竹学会综合文化中心
主办：马来西亚创作学会
开幕人：郭沫若
电话：03-21412003



壮哉豪哉， 可瞑目矣！

——纪念黄润岳校长

本报特约◎姚拓

1921—2005

此专稿向黄校长致敬……
称他为——黄校长。黄润岳校长日前逝世于加拿大。《南洋文艺》特以
誌。他对华文教育贡献良多，他曾是教总第四任主席。认识他的人都将
黄润岳先生是马来西亚名教育家、学者、作家，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



■黄润岳先生于1988年回马与友人小酌，前排左起为梁森元（翠园丈夫）、黄润岳、李家耀、李家耀夫人，后排左起姚拓、翠园。

黄

周岳校长，今年9月25日上午11时，逝世于加拿大渥太华。

黄校长生于1921年五月初八日，今年已是84岁。在年龄上说，不算低寿，但也不算高寿。但在友情上讲，老友又走了一个，令人伤怀不已！

1945年，黄校长毕业于中国政治大学；1948年在中国外交部工作，接触密友，南来马来亚。后来，中英断交，他就在马来亚停留下来，一直住到1975年，他才移居加拿大。在马期间，他是在英属中华教过书，又回和丰兴中担任校长，再后到龙引新文龙中学做了14年校长；在马六甲培凤中学做了10年校长。至于他在学校时期他所做到的教学本分，以及他在担任金马教师会总会主席时期他所作出的贡献，虽然时隔30年，后人对他的敬仰迄今未变，我就不再多谈了。

我和周岳兄私交甚笃。他在新文龙中学做校长，有一位陈梅庭教师，是我在香港的好朋友。1957年我去龙引拜谒陈老师时，在中学遇到了周岳兄，也许是我们年龄相若，同时又喜欢写文章，自此以后，我们两个就成为知心好友，即使他去到加拿大，也常有文字之约与书信来往，以迄于今。

我经常把周岳兄的故事，讲给朋友听。我说周岳兄一生的优点，就在他的“真”字上流露无遗。例如，他当了副总主席，有一天，他与严元泽博士等几个朋友，一同到古隆坡水坝去游玩，居然有人提议，要谁就跳进水坝“游泳”。结果他与几个朋友竟真的跳泳了一番。假如不是出自黄校长之口，哪里有人会相信这一群“正人君子”竟会如此这般“淘气”。其实，任何人都有“淘气”的机会，游泳又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做人？假如，当时有我在场的话，我也会立即脱衣下水。



其次，他有一年自加拿大来到吉隆坡文桥出版社演讲。我问他：这一次的飞机票由谁负责？他竟然随口答我：是他自己负责。我又问他：“你现在还有多少钱？”我一向知道他没有什么积蓄。他说：“只有加拿大币4千元，这次全用光了！”然后他又笑着对我说：“老弟，你不必为我的经济问题担心，因为我住在主的家里，随时，主会帮助我的！”虽然我也是基督徒，但没有他的信心。过后几个月，他来信告诉我：“主又为我安排了另外4千元加币，这是多年来我交的所得税多余的款项。如今，政府全部退还给了我。你看，我不是又有4千元的存款了吗？”

除了“真”，就是他的“信”。他曾经来信对我说过：“以后我写任何文章，都不能脱离了我的信心。”在他到了加拿大以后所写的文字，几乎都能遵守他的诺言——不离他的“主的信心”。

润岳兄有4个女儿，一个儿子，如今都住在渥太华他的住宅附近，他形容他的家庭是一个小的“联合国”。长婿是爱尔兰人；三婿是新西兰人；其他的都是华人。如今有孙子孙女12个人。当他们小时候都是外公和外婆亲手带大的。热闹中自然常有互相斗气的事情，真是有时不免有气可生。有一次，气得外公润岳兄居然在祷告中“大哭”了一场。他在祷告之前，先在心中想了又想，以往在学校中以校长领导数千名学生与数十名教师，无不头头是道；现在呢，却在教养了第二代之后，却天天又在教养着第三代，真是何苦来哉！人生岂不是灾难重重。谁知在他的祷告之后的一个星期末，却笑着问他太太显敏女士：“我怎么这么空闲？”

像这么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在我的朋友中实属少见。

他的做人原则，是做一个君子。什么是君子呢？

且听一听他的答案：“首先是《圣经》中耶稣说的‘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其次是老子的‘为而不恃’、‘无为而无不为’；还有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润岳兄一生的成就，就是这种“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人生。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壮哉豪哉，可敬可佩！

黄润岳档案……



■黄润岳先生18岁时的毕业证。

●于1921年端午节后一日出生在中国湖南省。

●早年毕业于中国政治大学，寒马居住48年，历任新文龙龙引中学校长14年，马六甲培风中学校长10年，后于1975年移居加拿大渥太华市。

●是马来西亚名教育家、学者、作家，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对华文教育贡献良多，他曾是教总第四任主席。

●今年9月25日上午11时，逝世于加拿大渥太华世家，享年84岁。

●平生著作颇多，计有：《英伦见闻》、《万里归程》、《英游杂记》、《教育丛谈》、《黄金时代》、《龙引十四年》、《闲思录》、《独中论丛》、《比生此放》、《基督教教育华人文化》、《古稀探密》、《风情琐记》、《金海集》、《诗调》、《窗外曲》、《事事与成长》、《天人合一与三位一体》、《从圣经观点看儒家思想》、《丰盛之旅》、另有出版小说：《逆流》、《旧时的黄昏》，共有二十多种。

他，决定我的终生

——悼黄润岳校长

本报特约◎艾芸

年初，与黄子兄聚首，谈起黄润岳校长近况，知道他许久没来大马了。月前，新文龙中华中学 1980 年度高三毕业同学在新山聚会，许多同学自离校后，才再重逢，彼此见面不相识，待互报姓名后，恢复了记忆，才讶然大笑。可不是吗？四十多年的别离，相见时，都是祖父祖母级的人了。此情此景，自然勾起绵绵的同窗旧情，更怀念当时母校黄润岳校长了。礼强兄特地带来黄校长的近照，他去过加拿大探访黄校长，照片中的校长，风貌依旧，别来无基。

如今，获悉黄校长回归天家，不觉震撼，却感惘然。

新文龙中华中学是由董事长郑振中先生和黄润岳校长联手创办的，他们心手相连，志同道合，那股爱护民族文化的赤诚，将他们磨合在一起，于是拼出了火花，试炼成今天的教育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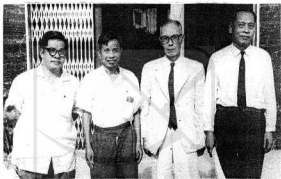
黄校长博学多才，校中有良师通力合作，经费有董事会承担，办学方针更向全国推展，使学生各展才艺。当时，学生不但学业成绩优异，体育运动标青，文娛活动蓬勃，在校外竟获得美誉，形成新文龙的特有校风，声名远播，吸引许多远地学生，寄留学校宿舍，培育许多人才，特别是在教育界服务，分布在全国各地，传承他的衣钵，为华文教育播种。

我退休十多年了，想起我如何献身教育，饮水思源，可说全仗黄校长的教诲与鼓励，至今无怨无悔，内心感恩，并深深地怀念他。

当年毕业后，家境不允许我升学，便只好去当临教，在穷乡僻壤的学校等批准执教准证，呆了一段日子，便到母校拜访黄校长。他非常关心我的前途。当他听我说不想一辈子做教师时，很严肃地说：“你既然志不在当教师成为你的终身职业，现在何必教书？”我被他那义正词严震慑住了，顿时无言以对，一时之间，对前途感到茫然无助。过后，他语重心长地给我勉励，教我如何确定人生目标。

我在那所乡村学校过了很短的日子，却感受到教育工作的意义，那群幼小的生命，深植在我心田，他们正等待着知识的浇灌。于是，我进入了师训学院，成为永久教师，从此定终生。

黄校长将一生中美好岁月奉献教育，鞠躬尽瘁，晚年，传扬福音，活出丰盛生命，打了美好的仗，安息吧，黄校长。



连五（第三任主席），
（第一任主席），蔡任平（第二任主席），林
图为他与前3任主席合影，右起为黎博文
■黄洞岳先生（左一）是教总第四任主席。



后一张书法。
■黄洞岳先生写给作家朋友黄子的最

黄润岳的一些著作……

程氏
周永年



■黄润岳先生一生著作二十多本，这是其中一些著作的书影。



■年轻时的黄润岳先生与夫人。





■黄润岳为人处处体现“真”与“信”的一面。

从泰北到台北 寻曾焰

80年代的马来西亚曾经有过一段泰北金三角热。那个时候,《南洋商报》副刊经常转载有关这些地方的文章,那些文章出自一个名叫曾焰的女作家之手。不少青年读者读了文章,很憧憬她笔下那些传奇性的地方,就结合几个伙伴,带着背包,自助旅行到满星叠、美斯乐。

◎张永修 散文



十多年前，我背了简单的行李，和一位朋友T搭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去到泰国首都。我们夜晚从吉隆坡启程，天亮时到达槟城北海，稍后再换另一班火车转往曼谷。泰南风景一如马来西亚乡村的景色，不同的是，洋葱顶的回教堂换成了尖塔型的佛寺。一路漫长而单调的行程，幸好遇到会华语的两个泰国客家姐妹。由于T和我都不会泰语，便乘机向眼前的泰国老师请教，恶补简单的泰语。从数目字到问价钱，到嫌贵讨价还价……，初学语言闹的笑话，和两国的地理民情交流，时间就很容易打发掉。然后天色就暗了下来。在火车上吃过晚餐，就各自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书。曾焰笔下的世界，稀奇古怪，紧扣住读者的好奇心理；那些离奇神秘的地方，诱惑着我们一路追踪直至泰国北部边陲。

将麻姑蜆精煮出“真水”，滴到眼里，可以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你敢不敢尝试？洗衣老妇对曾焰说。

对于读者，这样的诱惑和挑战，越稀



■夜丰壤国民党残留部落处于土地贫瘠的地方，砂石多，不宜耕种。

(张永伟/摄影)

奇古怪越不可思议，就越刺激。而对于曾焰，拥有这种异能的诱惑，则需要付出代价——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能说出来，泄露天机将会遭到灭门之灾。经过再三考虑，曾焰终于不顾后果，跑了出去。把癞蛤蟆精的真水滴到眼里，之后她连续几次看到同样的异象。再后来，她看到了即将发生在她的家庭里的重大事件。她的丈夫杨林在不久之后的战乱里不幸身亡。

火车经过再一夜的奔驰，第三天早上当地时间 10 时左右抵达曼谷。曼谷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还要北上。那两位客家姐妹带我们去买北上清迈的长途巴士票。清迈也只是我们的驿站。我们目的地在满星叠，那个作家曾焰曾经住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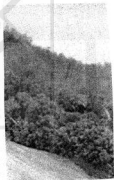


■除了校门口有一个拱形的木制牌坊以泰文说明那是一间小学之外，内部的校舍设备简陋，与一般民房相去不远。（张永慧/摄影）

满星叠位于泰国最北的地方，北对中国，西向缅甸。三国交界那片罂粟花盛开的地带，是著名的金三角，国际毒梟昆沙（张奇夫）'出没之地。从曾焰的《七彩玉》、《紫烟》、《满达烟波》等书里，我们看到十七、八岁的中国知青，被下放到云南边界，她与同伴3天之后逃到缅甸，遭到拘捕，逃脱，再被捕，入狱，被放逐，在缅甸境内的丹阳住下，过后再越过泰国边界，辗转到美斯乐、满星叠等地，并在当地任教。在异域的颠沛流离，让她后来写下让读者津津乐道的《美斯乐的故事》、《满星叠的故事》。

我们选择4月中旬游走泰国。4月13至15日，是泰国人的泼水节，也是泰国人的新年，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欣热闹。他们或在门口，或在公园，铺着草席，摆着食物，三五成群，抱着吉他，或带着卡带唱机，唱和谈笑，见到游客，相邀共饮，还说他们的米酒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酒。炎炎酷日，其实喝杯碎冰冻饮品，更为痛快。谈笑间，他们出其不意，当头一盆冷水，淋得你不知所措，引得哄堂大笑。你还来不及生气，他们已经向你祝福平安。泼水祝福，或者在他人脸上涂抹香粉，是泰国人的新年习俗。凉风吹来，冷水让气温下降，身体顿感凉爽，心情也就愉快起来。

曾焰在丧夫之后，心情郁郁，常蜗居陋室。一天有事必须外出，刚好遇上泼水节，她远远看到泰国人提桶走来，便先声夺人，高声警告来者不得向她泼水。她处处提防，不料还是被淋得有如落汤鸡。她怒



火中烧，正要破口大骂，回头一看，对方却是长着长鼻大耳的庞然大物，把她吓得花容失色。原来是只大象，一只多年不见的老友，曾焰唤它：酒鬼！大象闻声发出欢喜的回应。原来此象喜欢饮酒。每天早上饮了米酒就能卖力的工作。曾焰在美斯乐的时候曾要此象搬运木材建造校舍，每天必买玉米酒给酒鬼过瘾，酒鬼就在草地上欢欣起舞。甚至蹲下让曾焰骑到象背上，驮着曾焰绕圈子。遇到酒鬼，曾焰开始笑了，忘了被淋得满身湿透。

4月天的泰国天气酷热，气温40度，行李袋里的巧克力条融成泥状；我不能适应而开始流鼻血。巴士停在某处有瀑布山区，我用山水冲洗额头，鼻血即止。我开始领悟，酷热气温的凉水意义。冷水给人快意，给人祝福。

在清迈过了一夜，我们一早就要前往清星叠。山路弯弯曲曲，颠颠簸簸，比上马来西亚的金马仑高原的路还难行。巴士颠簸到达一个泰语发音为 Mae Hong Son 的地方，我们找了一家旅社住下。旅社有一年轻女工，15岁，白皙，会说华语。谈话中得知她家人来自中国云南，住在泰缅边界的国民党部落。一经询问才发现，Mae Hong Son 原来不是清星叠，也不是美斯乐。我们甚至连这两地的泰语发音都不知道，根本无从问道。然而问起方向，才知道我们到达的竟然不是原本计划中的北部，而是偏西北的边境地区——夜丰颂。既来之，则安之，何况此处景观山色与马来西亚大异其趣，有到了异域之兴奋。这里住宿便宜，60泰铢（约马币6令吉）一晚。吃的也便宜，普通一餐15泰铢（约马币1令吉50仙）。自助旅行一星期花费约5千泰铢（约马币500令吉）的开销，对收入不丰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消费便宜，相比之下，当地人的收入是可想而知的。

（文转下页）

(文接上页)

当地的旅游公司有一个泰缅边境的国民党残留部落的参观团第二天早上9时出发，我们便报名参加。这次走的山路更颠簸，8人在面对面的吉普车后厢跌跌撞撞，黄石子路后方扬起黄尘，向远山报告我们的行踪。到了中午，我们才抵达国民党残留部落。所谓部落，住的也只是数十家人口。那是一个土地贫瘠的地方，砂石多，不宜耕种。一些山地种了茶树，屋子周围疏疏落落的种着一些自己食用，如辣椒豌豆之类的蔬菜。屋子小，以树干树枝搭建，屋顶铺着干枯的大叶片，地面没有石灰土或木板地板，家具简单，有如放大的孩童搭建的玩意儿。没有基本的设施供应，水供电供网如。他们处在泰国的领土，却没有得到泰国政府的照顾。可能泰国政府认为，提供地方收容这些流亡分子，已经是很人道的 ways 了。据说，泰国北部还有几处国民党残留部落，包括在满屋叠、美斯乐。（又是满屋叠、美斯乐！我们错过地方！）据一位年四十余的阿叔说，台湾国民党侨委会给了他们一些很实在的援助。那就是在低洼山谷引水成湖，再拨给鱼苗，让他们常年可以钓取食用。我们看到湖泊枯树树干抓天，我问为何不将树木砍伐之后才引水灌湖？阿叔说那可要大费周章，需要动用更多人力财力；这样也有好处，树木枝桠缠绕，就无法撒网捕鱼，鱼就可以永续生存，他们就常年有鱼可吃。

有两个没穿裤子的4至6岁小孩一直缠绕阿叔身旁，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身边的这两名之外，还有一名15岁的女儿在镇上旅社工作。那么巧，就是我们下榻的旅社的那位白皙女孩。在这个穷乡僻壤里，年轻的都跑出去镇上或城里寻求生计，一些走得更远，去到清迈或曼谷。他们这些残留下来的国民党民兵，没有其他肯收留他们的地方，他们只能在这里终老。

问起小孩的教育情况，阿叔带我们到附近唯一的一间学校去。除了校门口有一个拱形的木制牌坊以泰文说明那是一间小学之外，内部的校舍设备简陋，与一般民房相去不远。泰国当局规定，学校教学媒介语为泰文，新生代已经普遍用泰语沟通，能说流利华语的已经不多。当地的华裔教师就私下负起教授华文的责任，义务教导有兴趣的学生。有关课本也是由台湾侨委会提供。由于课本数量不多，华文课本都由华文教师保管。上课时分给学生，下课后收回，以便来年还可让新生使用。

(上)



■国民党残留部落里的一位阿叔说，台湾国民党侨委会给了他们很实在的援助，那就是在低洼山谷引水成渠，再拨给鱼苗，让他们常年可以钓取食用。

(庄永穆/摄影)

2008年4月1日 ● 星期六

南洋副刊 南洋文艺 D13

逢星期二、六见报

逢星期二、六见报

曾焰简介

1952年生于云南，祖籍四川，1970年下放云南边陲，即投奔到缅甸丹阳，1974年辗转回到泰国美斯乐，1980年到满里曼，1983年带着两名女儿抵达台北，就职于《青年日报》副刊。（张永慧/摄影）



还在泰北的时候的1979年，曾焰已经在台湾出版她的第一本著作《七彩玉》。然而她最初发表作品的园地却不是台湾，而是香港的《当代文艺》杂志。曾焰说，当时物质贫乏，她也不知道写文章需要用稿纸这回事。她的文章写在用过的考卷后面，曾在学生用的练习簿上。

曾焰 离开缅甸之后，投奔在泰国美斯乐的“国民党六十军”段希文将军的部落，此部落后来改名为“五军”。据曾焰说，当时泰国并没有干涉这批驻扎在其领土之上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或许因为这批军队的存在可以协助泰国防御其与泰国昆沙的干扰。

在缅甸升阳时期，曾焰曾教过小学。当时的教材都是采用一位杨姓老师所编的范本。后来也有课本由马帮从泰国运带过来。马帮是带着马匹走山路买办货物的队伍，他们带来的课本乃由台湾侨委会提供。1974年来到美斯乐，曾焰就在五军办的兴华中小学任教，初时教小学，后来因曾焰有著作出版，升教中学。这是一所从小学一年级办至初中三年級，相当正规完整的学校，是邻近地区唯一所以华文媒介教学的学校。据说鼎盛时期，学生近千人，多寄宿在学校宿舍。学校的情况因



■山路弯弯曲曲，颠簸颠簸，比上金马仑高原的路还难行。天气酷热，气温40度，行李袋里的巧克力会融成泥状。
(张永修/摄影)

陋就陋，墙是竹片编起来的，屋顶是铁皮盖起来的，地板就是没有木板没有水泥的黄土地。后来情况稍微改善，墙角砌了红砖。这里的学生每人都可以得到台湾侨委会提供的新课本。学生缴的学费、住宿费就是教师薪水的来源。在缅甸丹阳，曾焰教书的薪水每月相等于700元泰铢（约70令吉），在泰国美斯乐，薪水千二，至后来的二千泰铢。当时的薪水不算高，买了日常所需，就所剩无几了。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曾焰任教泰北时期，到我在80年代中期旅游泰北时，相隔大约仅10年时间，泰国华文教育的处境竟已经历一番苍凉，一方面则是台湾国民党侨委会对泰北的支援已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则是泰国政府实施对华文教育的管制。随着21世纪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所带动的华语强势经济效用，不知今天泰国的华语政策是否已经改弦易辙？2005年在泰南勿洞成立的中文大学是否带有深层的政治意涵？

2005年我来到台北，听一个朋友说起她的二房东是一名作家，名叫曾焰，让我不觉想起当年的泰北行旅，和那个青涩的年代。经过安排，我终于在台北兴隆国小附近的公寓五楼，见到20年前那一系列泰北神秘故事的作者。曾焰形容富态，头上大波卷发，眼戴大框眼镜，态度亲切而健谈。之前她刚生了一场病，如今已经康复，看起来气色很好。

曾焰1952年生于云南，祖籍四川，1970年下放云南边陲，即投奔到缅甸丹阳，1974年辗转转到泰国美斯乐，1980年到满星叠，1983年带着两名女儿抵达台北，就职于《青年日报》副刊，并在台北师范大学深造。不过后来由于工作与学业很难兼顾，而改读台大中文系夜间部。在这半工读期间，曾焰将孩子送到“大陆救灾总会儿童福利中心”照顾，周末的时候

才将孩子带回身边。数年之后，她有了第二段婚姻。第二任丈夫随着台湾开放大陆探亲限制之后返回大陆，再也没有回来，留下给她的是岁的男儿。曾焰以一妇人之力将3名孩子拉扯带大，其中辛苦，外人可以了解，却无法体会其中万一。如今长女在加拿大定居，次女在美国念大学，最小的儿子16岁，念高一了，对电脑科很有兴趣。提到孩子，曾焰脸上多了笑容。她还养了一头活泼的长毛白犬，让我想起她在美斯乐那头叫乒乒的高贵品种的狗。

1979年还在泰北的时候，曾焰已经在台湾出版她的第一本著作《七彩玉》。然而她最初发表作品的园地却不是台湾，而是香港的《当代文艺》杂志。曾焰说，当时物质贫乏，她也不知道写文章需要用稿纸这回事。她的文章写在用过的考卷后面，曾在学生用的练习簿上。然而《当代文艺》的主编徐速并没有因此而将它投置，反而将她寄去的文章都刊了出来，这给她很多鼓励。后来她认识了一个到美斯乐观光的曼谷亚洲理工学院的学生庄富琴，庄到台湾留学的时候，将曾焰的文章推荐给出版社的朋友，经几波折，后来才出版了《七彩玉》。至于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发表的文章，曾焰表示，那是由王润华、淡蜜夫妇热心帮忙推荐过去的。多时



■在异域的颠沛流离，让曾焰后来写下让读者津津乐道的《满屋叠的故事》。图为时报出版的两本不同版本的《满屋叠的故事》。

(张永修/摄影)

寻曾焰

(下)

不见曾焰的文章在报端出现，以为她已经不再写作，却不料她已有著作二十余本，近年还出版了《东路天堂》（黎明文化，2004）。此外她也曾获得多项文学奖项，包括国军文艺金像奖、中山文艺小说奖、中国文艺协会小说奖、中兴文艺奖等。

臺北还有曾焰的亲人：干妈和干姐，和她前夫杨林的墓。然而离开二十多年，她也只回去过两次。臺北也许真是她不堪回首的过去。当谈到怀着大女儿被强奸追杀，虽然事隔多年，她仍不禁掉下眼泪。说到当年预见杨林之死的情况，她仍百感恐惧。我悄悄问她是否仍然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她忙不迭摇头，说根本不敢再去想这些，还是实实在在的过当下的生活最重要。

对于不确定的未来，也许真的没有人能说得上什么。后来我也与当年同行的T失去联络。听说他在半岛南端一家旅行社当导游。在所有异域都成为例行工作行程的一部分的时候，新奇的事物将会变作平常无奇。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在清迈时投宿时，旅社负责人熊小姐爱上T。在我们前往 Mae Hong Son 的那天早上，她到车站送行，与T难分难舍。结束 Mae Hong Son 之旅后，T突然改变行程，转去清莱，我依原定计划回返清迈，住回同样的旅社。熊小姐看到我，一再追问T为什么没有一起回来，我无从回答。几天前与T临行依依时，熊小姐也无法预见如此的未来。

以前说要去臺北旅行，朋友以为我要去台北。现在人在台北，却想起臺北往事，想起曾焰的美斯乐与满屋叠，和我实际走过的 Mae Hong Son。当年去臺北没有找到曾焰的美斯乐与满屋叠，终究有与传奇擦肩而过的遗憾。如今在台北找到曾焰，然而时移事往，金三角的传奇也早已离她远去。

《马华文史自编自利书目》

1. 我的文学路
2. 2002年300字极限篇
3. 浅谈马华文学
4. 2003年300字极限篇
5. 马华作家的悲欢岁月
6. 2004年300字极限篇
7. 名编系列与其他
8. 2005-2011年300字极限篇
9. 马华文学90年与其他

(以上9册全已编制完成)

以上作品或其他马华文学的电子书,可在下列两个网站下载:

1. 作协网站: 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2.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www.mcldl.com

合集

马华文学 **90** 年与其他

雅波 整理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2 年 08 月 21 日**